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世纪接班人素质培养

文化知识素养能力



第一章 土朝与官制

帝王文学世家

我国历史上天子门第，擅长文学的，举世“三曹”、“七萧”。曹操、曹丕、曹植为建安文学的创始人。曹孟德是罕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诗风沉雄古朴，时露霸气而有新意。曹植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之誉。魏文帝曹丕才情不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在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典论·论文》又开文学评论之先。曹丕异母弟曹彪、其子曹睿、子曹髦也都有诗名。这样算来，曹氏文学相袭有四代。

南梁武帝萧衍从小爱好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登上帝位后，俨然以诗坛首领自居，他的八个儿子中，竟有萧统、萧综、萧纲、萧纶“七岁有诗癖”，他当太子时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等文人雅士唱和，开创了“宫体诗”。后来萧纲被俘囚禁，临死前还写出了《被幽述志诗》，可见他对文学的专注。另外萧统编的《文选》（世称《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萧绎曾为名负一时的神童，五岁能背《礼记》篇章。后来萧绎瞎了一只眼，依旧博览群书不倦，他还擅长写回文诗。

南唐李氏父子都不是称职的天子，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帝王。李璟其父李升，创立南唐国，治政有方，但也不乏才气，李升9岁时写出了《咏灯》诗，李璟的文学修养多少受到家庭的熏陶。李璟长得眉清目秀，举止雍容儒雅，陆游赞他“多才多艺，好读书”，他10岁就作《咏新竹》诗行世。李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小令，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王安石认为其意境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上。李璟的七子李从善、九子李从谦均能诗文，第六子李煜则是中国词坛上第一流名家，堪称词国皇帝。李煜相貌俊秀，风采飘逸，相传宋神宗赵顼观其画像，赞叹倍加。李煜词分两个阶段，前期的词文采洋溢，但情调不免柔靡；亡国后才知愁滋味，其词情真意切，不加粉饰，更兼他洞晓音律，擅长白描，将抽象化的感情形象化，以明净、优美的语言，摆脱了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作风。李煜的次子李仲宣，4岁能填词，是个早慧的神童。可见李氏四代，均与文学有缘。

明人张溥曾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似乎还应该加上“南唐二主”。曹、萧、李三家的文学相袭，大概也是一个奇迹。

帝王中的戏迷

我国古代戏剧的盛行与发展，与皇帝的喜爱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中曾出现过不少“戏迷”。

皇帝中的第一位戏迷，当推秦二世胡亥。他登位后沉湎于声色，尤喜歌舞。命人在“傩”（古代戏曲前身）的基础上将曲谱配管弦，填上词，发展成有情节的戏曲，这就是今天陕西“秦腔”的前身。秦朝还设有戏曲音乐机构“乐府”，专为宫廷服务。

汉武帝对戏曲也非常重视。他曾将乐府进行一次扩充改组，使这个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仅乐工就有上千人。

盛唐时代的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位著名的“戏迷”，他不但有歌舞癖，还将梨园辟为训练戏曲人才的教场。从此，“梨园”便成为戏曲界的代称。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戏曲活动，并命人设立专门培养伶人、歌伎的机构“教坊司”。他还常亲自根据元代杂剧的曲子写词，如他有首词曰：“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就是根据元代一杂剧的楔子“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改写的。

明熹宗朱由校嫌看戏不过瘾，索性客串做票友。有一次，与高永寿同演《雪访赵普》，他在戏中扮演宋太祖。时值初夏，他竟冒暑穿上冬装戏服，可见其用心之诚，戏瘾之大。

清代康熙帝曾下令将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宫中排演，并常莅广和楼戏园，还颁赐戏联曰：“日月灯红酒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此事传颂一时，广和楼之名亦因此大振。

乾隆皇帝三次南巡，皆喜观赏戏剧。北归后遂召苏、皖名伶入都，供奉南府，为清代四大徽班（三应、四喜、春台、和春）入京之始。此时湖北的二簧、西皮渐传北方，高腔、昆曲衰微，皮黄日盛。乾隆帝还耗巨资在圆明园建造了一座大舞台。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乾隆帝是京剧的开山鼻祖。

慈禧太后更是古今第一大戏迷，几乎天天看戏，对京剧很精通。她嫌观戏不过瘾，有时还着戏衣与李莲英联袂歌舞。

秦皇、汉武与海市蜃楼

秦始皇、汉武帝欲长生不死，辄遣人入海求仙，原因何在？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载：“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群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海市蜃楼，今日已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载：“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海上居人，可说是唐代人对海市蜃楼的认识。秦汉时，神仙方术盛行，此类奇特现象难免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把“海上居人”说成“海上居仙”，未必无人相信。因此秦皇汉武为之所感，也是不难理解的。

爱读书的皇帝

南北朝的北魏教文帝元宏好读书，手不释卷，骑马坐桥都不忘讲道。他还有个很大特点，是爱亲自拟写文书，好多是在马背上口占而成，成文后不用更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朝廷的诏策都出自他手。

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自小酷爱读书。一次，他患了疥疮，怕苍蝇叮发臭的伤口，就躲到蚊帐里读书。后来，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视力也很差，就叫侍者读书。读归读，用归用，最后被西魏战败，亡了国。他下令焚烧古今图书14万卷，说什么：“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朝的文宗皇帝，手不释卷，天天挤时间博览群书。有人劝他不要因读书把身体搞垮了，误了国家大事。他据理反驳：“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

即何以为君？”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朝廷一时读书空气浓厚。

在众多刻苦读书的皇帝中，康熙算是佼佼者。他不但读中国书，而且读外国书。他学习欧洲文字、几何学、数学、哲学、音乐。学几何学时，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攻下了欧几里得全部定律。之后，又学起巴蒂氏的《实用理论几何学》。他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太祖的书法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偏爱书法，时常提笔练字，可练来练去没有多大长进。周围的人反倒奉承他的字压倒王羲之，气煞米南宫。

某年腊月的一天，朱元璋携带文房四宝，扮成个落魄文人，挨门挨户给店主书写对联。由于他的字写得很糟，没能受到店主们的欢迎。可他写字不收酬金，店主就随便让他写几幅应付了事。这一天下来，朱元璋共给人写了61幅对联。

春节之日，朱元璋派人暗地走访，察看对联，结果是61幅对联中只有一幅被一店主贴出来，而这幅对联还倒着贴，其余60幅都被店主们撕掉烧毁了。

朱元璋大怒，立即传旨，把那些店主统统抓来“问罪”。当朱元璋问及为何不贴那落魄文人的对联时，店主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申辩说，由于那酸秀才写的字实在糟透了，根本没法贴出来亮相。而那唯一倒贴出对联的人却又是一位不识字的主儿。

朱元璋羞愧难当，当即把店主们放走了。

十岁皇帝的课程表

明穆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穆宗死后，辅佐10岁的小皇帝神宗当政，还是神宗的老师。他曾为小皇帝规定了如下一张课程表：

——每日接续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

——进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临将各衙门奏章，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问，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进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人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查得先朝事便，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康熙公开“小报告”

康熙末年，有个江南总督叫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整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官声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忌恨在心，便寻机参劾，要将他充军黑龙江。康熙没有同意，觉得陈鹏年很有才学，就调他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还不罢休，又密奏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丘”的诗，说诗中有怨恨不满情绪，应予治罪，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年事虽高，却仍然很清醒。他细读了陈鹏年的诗，并不觉得有什么“怨恨悖谬之心”；再看噶礼的密奏，深以为噶礼完全是挟嫌整人。于是，他召集群臣，当众宣布：噶礼总喜欢惹事生非，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就想坑害他。并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丘诗公之于众。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官吏”小考

所谓官，最早寓有管理的意思，是负责维持秩序、督促生产、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事件的人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朝廷治事处，曰官”。官的数量，随着政务的复杂而逐渐增多；官的职任，随着体制的发展而分工愈细，因此，“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

吏，古代百官的通称。《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三吏，三公也”。汉朝以后，始称位职低微的官员为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至明清则称各衙署之房吏书办无俸禄而供事于官的人为吏。“吏”进身为“官”称“吏道”。这一仕途，起始甚早。在唐代称“流外入流”，宋代称“流外补选”，金、元叫“吏员出职”，明代则简称“吏员”。在元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极其有限，时人认为“止是万分之一耳”，大多数官员都来自吏员出职。曾有人指出，元代官员十分之九出自刀笔吏。

师生回避

从唐开始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故旧关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亲戚一样进行“别头试”。清朝师生故朋回避最严厉，规定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我国古代不但对官吏任用实行回避制度，而且对违背回避制度的官吏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宋朝政府规定，官员到任30日内，要自报有无回避之处，未上任前自报亦可。如果应回避又不自报而直接去任职的，“杖一百”，还不计算他的做官年资。

帝王选才看脸相

古时考生在进士及第以后，为了进一步筛选人才，帝王还要当面殿试复审。殿试是考策问，要求考生对当前国策用笔试形式陈述自己的见解。此外，

王者可以亲自看一看考生的仪表、脸相。视脸相之重要甚至不亚于其人的学问识见。如果甲进士有一张田字脸，而乙进士有一张国字脸，那么帝王会优先选择哪一种人呢？

据史书记载，汉时文帝曾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要他们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武帝也曾下诏天下求“茂材异等”。很明显，汉文、汉武要求的是包含有不同思维形式的优异人才。

我国传统说法，谓“相之大概，不外人格”。所说八格，就是包括四字脸、国字脸等的八种不同脸型。古人是把不同脸型作为窥视人们外在品貌与内在思维的直觉窗口。

八种脸型中，B型思维宽广开阔，有一张四方形的脸形；A型思维深沉严谨，有一张长方形的脸形。如果选用前者，这种人有开创性，善于协调官僚之间的关系，但稍欠深度。选用后者，这种人有深度，但欠缺开创精神，也不善协调人群关系。国字脸者介于两者之间，包括有A型、B型的性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也就是既贤良方正，又善于真言极谏，这正是帝王所优先选用的人才。

古代廉官美称拾趣

“一钱”太守 后汉刘宠，任会稽太守，操守廉政，深得民心，离任时，当地老人拿了一百钱为他送行，刘宠不肯收，后因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一钱做为纪念。于是，“一钱太守”的美称就传开了。

“二不”公 明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当时许多亲朋好友登门相求，范均一一谢绝，并在府门上书六个大字：“不受嘱，不受馈。”从此，他被人称为“二不”公。

“三汤”道台 清汤斌，曾任岭北道台，三年为政，每日三餐以豆腐汤作肴，百姓因此送他“三汤道台”美称。

“四知”先生 后汉杨震，任东莱太守时路经昌邑，县令王密曾是杨震举荐的门生。到了晚上，王密以十两金赠杨震，说：“天黑，没人知道。”杨震严厉回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携金而还。此事传开后，大家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五代”清郎 袁津修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为官50年，始终以清贫为本，连一升酒的薄礼也不受，于是人们皆呼袁津修是“五代”清郎。

成语典故中的“宰相”

山中宰相 南朝陶弘景隐居山中后，朝廷每有大事，必定遣人询问他，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今泛指那些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

伴食宰相 唐朝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及姚崇，遇事推诿，不敢负责，时人称之为“伴食宰相”。后指那些吃饭不干事的高官达人。

弄璋宰相 世人皆知唐朝宰相李林甫“口蜜腹剑”，却不晓他还是个别字“专揭”。一次，李在写信庆贺亲戚生了孩子时，将“弄璋”（古称生男曰“弄璋”，璋为玉器）写成了“弄獐”（獐为野兽）。后遂以“弄璋宰相”

来戏称没有文化的权贵了。

模棱宰相 唐代小有名气的文学家苏味道，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常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世号“苏模棱”。武则天圣历初年，苏味道官居相位，处事更加圆滑，人称“模棱宰相。”

青词宰相 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长生术，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起草祭祀文章。这些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谓之“青词”。而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词臣均以进献“青词”邀宠，卒至拜相。因此，时人称他们为“青词宰相”。后讽刺那些升官阶梯并非正路的人。

棉花宰相 明朝大学士（宰相）刘吉，精于营私，不知理国，尸位素餐，无所建树，因此屡遭谏官弹劾，但他凭借逢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等手段，把弹劾他的谏官一个个都排挤打击下去，竟使他在内阁呆了整整 18 年，因此被人称作“棉花宰相”——所谓“棉花”，是取其“耐弹”之意。后泛指那种巧于仕宦的官僚形象。

丹青宰相 唐朝画家阎立本，工于写真，朝野驰名，大受高宗赏识，于公元 669 年拜为右相。但他终是个艺术家，“无宰相器”，缺乏政治才干。当时，大臣姜恪因作战有功被升为左相，时人评论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于是，阎立本被称为“丹青宰相。”

驱驴宰相 唐武则天时，才能平庸的王及善，官居右相，后又改为文昌左相，时人说他是“鸠集凤池”。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只作出一条规定：各部官员不准骑驴上班。为了实施这条规定，他派人终日驱逐，有时还要亲自参加，于是得了个“驱驴宰相”的外号。

三不开宰相 五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马胤孙为相。此公的为政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理政务），见客口不开（不谈国事），归宅门不开（不接见士大夫及下属官员）。”因此，时人称他为“三不开宰相”。

三旨宰相 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 16 年，无所建树，只起了个上传下达的作用：他每次把部门的奏章呈送给皇帝时跪请：“取圣旨”；奏章阅批后跪接道：“领圣旨”；出宫时向有关部门答复说：“已得圣旨矣。”总之，他事事依旨而行，离开圣旨办不了任何事情，时人称之为“三旨宰相”。

浪子宰相 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游纵无检”，行为放荡，好作淫词艳曲，自号李流子。他位居宰辅，不理政事，只知享乐，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于是，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

蟋蟀宰相 南宋末年，贾似道以其姐受宠于理宗而爬上相位。至度宗时，因拥立功而独揽朝政，权倾朝野。他为相 10 多年，祸国殃民，荒淫无度，常与姬妾伏地斗蟋蟀，还根据自己养、斗蟋蟀的经验，写成一部《促织经》行世。后人称之为“蟋蟀宰相”。

古代的秘书

历代统治者都很清楚地懂得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

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的要求较高。《说文·叙》云：“学僮十七岁以上，始试，讽籍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意思是说：学僮 17 岁以上才能参加考试；能够背诵籍书

(古文字,即篆书)9000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人们都知道,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大字典,全书收字不过9300多个。而史官要识字9000,这在当时是不易做到的。

汉末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他们除了要求秘书人才有较强的识字能力外,还要妙选通识文学之士为之。

唐代设立翰林院,许多翰林学士都是文学方面才华出众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担任过皇帝诏书的选制工作。著名诗人李白,就曾在金銮殿上代草王言。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曾做过秘书工作,他写的《讨武文檄》,妙笔生辉,连武则天读后也发出如此慨叹;“宰相安得失此人!”

唐代对于秘书人才的要求更高,既重视其文学才华,也重视其政治上的才干。唐太宗提出“耀才而居”,反对让那些唯唯诺诺、阿旨顺情、苟合取容的人担任秘书工作。他认为秘书工作应由那些有才干,敢于谏议,能起助手、参谋作用的人担任。

元代提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元典章》),即根据节吏的品德、业务能力以及资历情况,择优选用秘书人才。除了这三条,还要有保结,经过监察审查以后才能任用。可见到了元代,在选择秘书人才方面不但有考选制度,而且有审查制度。

“三只手”与范仲淹

“三只手”,人人皆知,小偷小摸之代名词、同义词也。此称呼有个来历:北宋天圣年间,东京黑道上有个赫赫有名的神偷。按照江湖规矩,不兴打听真实姓名,不准寻根问底,他的真名实姓至今也是个谜。当时的小偷,都是把一枚铜钱,磨得锐利无比,用以割人腰包,俗称“跑明钱的”。此公独特,不用任何工具,只要擦身而过便手到擒来。有次他为同行献技,双手高举,一挨身就把银子掏出来了,好像身上还长着一只手。众人五体投地,敬送绰号“三只手”。

然而,盗亦有道。“三只手”给自己的门徒规定了“三不偷”:一不偷忠臣义士;二不偷贫寒人家;三不偷良家妇女。偶尔偷钱,必定加倍奉还。门徒必遵“三不偷”的“祖训”,否则被视为不肖子孙,逐出“山门”。

据说,一次“三只手”的门徒错偷了大忠臣范仲淹的银子,事后不仅加倍奉还,还在银子里夹上一张纸条:“不知是范忠臣的银子,今加倍奉还,望乞恕罪。”落款:“三只手”。范仲淹想到朝廷昏庸,官场黑暗,达官贵人,明抢暗夺,竟还不如一个小偷!遂提笔在手,写一打油诗:“世人都恨盗,岂知盗亦道;若然都有义,怎会世颠倒!”写毕,掷笔于案,喟然长叹。

海瑞并非“完人”

海瑞(1514-1587)是明代大臣,以推行“一条鞭法”,为主严惩贪官污吏而闻名朝野,从《明史·海瑞传》、《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戏剧《海瑞罢官》,到电视连续剧《海瑞传奇》,海瑞一直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人物,加以赞颂的。他那种敢于同权贵奸佞作斗争的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传奇式事迹,一直被人们所称道。但海瑞并非“完人”,在清官海瑞的背后也有不少令人厌恶的劣迹。

一是“居家九娶而易其妻”。这在明人沈德符著《野获编·补遗》中就有记载。海瑞一生中，曾先后收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为妻，史书说他年“已耄而妻方艾”，这真可谓是“白发”戏“红颜”。甚至在花甲老朽之年，仍兴致甚浓地迷恋女色，收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少女为侍妾，以致引起家中妻妾争风吃醋愈演愈烈，致使其中两妻妾同日自缢身亡，两妻妾被休弃，逐出家门，成为谏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

二是“以救补名节饿死幼女”。这则血淋淋的史实见于明人姚叔祥著《见只编》载：“海忠介（指海瑞）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其手段几近残忍。

唐太宗谈贪污受贿

唐太宗执政后，一方面用令格和式规范官吏的行为，用诏敕强调廉政规定，用律打击腐败行为，严格依法执法；另一方面又多次告诫官吏廉政，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说明贪污受贿的害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据可查的不下四次。

第一次是在他执政初时（627）。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明珠是十分贵重的，如用它弹雀，不是很可惜吗？人的性命比明珠还贵重，但“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而贪污受贿，岂不是“不惜性命”。一旦“赃贿既露”，那一切都完了。因此，千万不能通过贪污受贿“求荣”，妄受他人之财，为人所笑。

第二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二年（627）。唐太宗又对侍臣们说，贪污受贿实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比如五品以上官吏，已是“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受人之财也不过数万。但一旦“彰露”，就会禄秩全夺，甚至“必亡其身”，贪财人反被财害。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而“事觉自死”，千万不可再蹈此“覆辙也”。

第三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四年（629）。唐太宗对公卿们说，我“终日孜孜”，不仅为百姓，也为你们。如果大家都“小心奉法”，不但百姓安宁，他们也“自身常得欢乐”。相反，如果徇私贪污受贿，违公法，损百姓，即使“事未发闻”，心中也会惧怕，“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可贪财物，害身命，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望大家深思此言。

第四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十六年（643）。唐太宗再次对侍臣们说，古人说：“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覆巢于本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覆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天，你们身居高位，食禄丰厚，应当秉公办事，“长守富贵”。如果贪冒财利，不就和鱼、鸟一样吗？大家要以“此语为鉴试诫”。

第二章 教育人才

我国教育史上的七个“第一”

1.我国第一个以毕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孔子。他从30多岁起广收门徒，教育活动历经40多年，前后教育弟子3000。2.在中外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启发式教学的是孔子。他的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给后人留下了“启发式”、“举一反三”的教育教学经验。3.在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量力行”原则的人是墨子。他主张学习“必须量力所能至”，做到“深其深，浅其浅”。4.第一个倡导自学成才的教育家是孟子。他把自学成才称作“自求自得”。5.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系统地阐述教育和教学理论的专著是我国的《学记》。它比外国最早的同类专著早300年。6.我国最早的学生守则是战国时期的《管子·弟子制》。距今已有2000多年。7.我国第一个撰写家庭教育课本的是南北朝的颜之家张謇。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国家富强之道”。

现代教师的喻称和誉称

到了现代，教师的称谓除保留有“先生”、“老师”等古称谓外，人们赋予新时代的教师以种种的喻称和誉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这是人们对教师的誉称，也有人把教师誉之为给人类带来文明、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普罗米修斯”，孩子的“第二父母”。更有人常把教师喻称为：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已了“蜡烛”；年年岁岁吐丝不尽的“春蚕”；默默无闻让千万人踩踏的“台阶”；送攀登者上光明顶峰的“人梯”……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教师奉献精神的赞许，对教师崇高工作的讴歌。

名人尊师趣录

毛泽东敬酒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邀请自己读私塾时的老师毛禹珠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为老师敬酒，使毛禹珠不胜荣幸，感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则说：“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周恩来赠款 1952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患病逝世。周恩来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花圈上写着：“伯岑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后来，周恩来将自己职赞的500元钱送给张伯岑夫人，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张伯岑夫人及其子女。

朱德敬礼 1959年初春的一天，朱德在云南政治学院礼堂看戏，突然服务员带进一位老人。朱德一眼认出老人是自己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叶成林，他急忙起身，立正行礼，礼毕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叶老师，请坐！”待老人坐定后，他才自己入坐。

叶圣陶赞班主任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解放前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很是赞扬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一次，他在讲话中这样说：“全国有成千上万的班主任，他们热爱下一代，热爱教育工作；他们根据教育原理，不断研究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们团结共事的老师，彼此观点一致，

实践一致，把孩子们熏陶，给孩子们训练，使孩子们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理想有道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后继队伍。咱们应该感激广大班主任，真心诚意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教师喜联拾趣

某高校两位教师燕尔新婚，调皮的学生书赠一副喜联：“大圆小圆同心圆心心相印，阴电阳电异性电相互吸引。”横批：“公理定律。”原来这两位教师，一位教几何，一位教物理。联中采撷几何和物理术语，妙在双关。

两位教几何的教师喜结良缘，同事撰书一副喜联：“恋爱自由无三角；人生幸福有几何。”横批是：“天遂人原。”将“三角”与“几何”嵌入联中，妙语双关，耐人寻味。某地一位教植物学的教师和一位教动物学的教师缔结百年之好，有人送一副喜联：“常慕连理花并蒂，今效鸳鸯蝶双飞。”横批是：“瓜熟蒂落。”联中贺辞：“三锯不出本行”，亦妙联耳。

爱情之路并不平坦。一位数学教师因十年浩劫，推迟婚期，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完婚。同仁们撰联相贺：“爱情如几何曲线，幸福似小数循环。”横批是：“忆苦思甜。”几何曲线表达了爱情历尽坎坷曲折，小数循环是借以祝贺新人美满幸福，地久天长。数学术语“曲线”对“小数”，既巧妙又贴切，令人叫绝。

某乡村中学，一对数学教师结为百年之好，工会赠予一副喜联：“恩爱天长，加减乘除难算尽；好合地久，点线面体岂包完。”此联语言朴实，浅显易懂，尤其是巧妙地应用数学名词来表达美好祝愿，自然而别致。

某同校的两生物教师，平日互教互学，感情甚笃，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事们赠一喜联云：“恩爱如植物，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婚恋贵同心，精诚团结播种育苗。”此联赠贺这二位新人结婚，意境全新，既影射两人任教科目，又祝愿他俩偕老白头，美满姻缘。

某地教工宿舍贴有一副奇特的婚联。上联是“1234567”；下联是：“ABCDEFGH”，横批是“OK”。却原来是音乐教师与外语教师喜结秦晋之好。更奇妙的是横批中“O”乃是乐谱符号，“K”还是英文字母。合起来看，“OK”真是正相匹配，同心永结之好。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某地一历史教师与一音乐教师的婚联，联语曰：“室内容古今中外；琴中飞1356”。此联通俗诙谐，趣味盎然，颇见匠心。

教授故乡博士城

江苏宜兴、浙江东阳出了很多人才，现在外地工作的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分别有620多人和1149人。

在我国科学家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科学院，宜兴籍的学部委员就有9人，东阳籍的学部委员有4人。在艺术界，继绘画大师徐悲鸿之后，有吴冠中等人。电影艺术家有于伶。还有被誉为我国“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新闻学家徐铸成等。

宜兴和东阳自古以来就重教成风。宋代元丰年间，苏轼在宜兴建立书院，到清末全县有9个书院。在这段历史时期，宜兴出了6个状元。

过去有“无宜不成校”的说法，宜兴中小学毕业生有很多人考上外地的

大学、中学，因此不少大中学校都有宜兴籍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无宜不成教”的说法，即外地的各类学校，特别是苏南的学校，都有宜兴籍的人在那里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大等 24 所大专院校的校长都为宜兴籍的教授担任过。更有趣的是，同出生在该县高塍乡小桥头村的蒋南翔、虞兆中，一个在北京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一个在台湾当过台北大学校长。至于东阳，唐宋时期就遍建书院、学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叶适都曾在这里设坛讲学，学风昌盛造就了一代代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尊师重教之风更盛。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东阳已向全国大中专学校输送新生 1.2 万多名，是建国前 17 年的 3.7 倍。近十年来，这里平均每年都向高等院校输送新生 700 多名，居浙江省首位。

第一所近代幼稚园

清朝末年，张之洞在主持湖北政务期间，大力提倡兴办新式教育，各类近代学堂纷纷设立。源于西方的学前教育机构——近代幼儿园在我国出现了。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幼儿园。

1903 年 9 月，湖北巡抚端方的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湖北幼稚园于武昌阅马场。由于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这个幼儿园的办园方法是仿照日本的，同时还特地从日本聘来 3 名女师范生为教养员，负责保育教养幼儿。

幼稚园落成后，以端方的名义贴出告示，招收 4-6 岁的幼儿入园。但由于当时幼儿园刚刚出现，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一般人家宁愿送孩子去旧式的蒙学馆，也不进幼儿园。因此最初入园的，多系生计困难的贫家子弟。幼儿园对入园儿童免收学费，“一切服装，图书、保育物品，均属官备”。

幼稚园的教育任务和教育特点与现代已有许多相同之处。据 1904 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记载，幼儿园的教育任务是“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主张“幼稚园重养不重学”，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声称“有此蒙养，将来就学自然高人一等”。根据幼儿的特点，湖北幼稚园设立了七门保教课目：一、行仪，就是教育幼儿行为端正，举止有礼，仪表整洁；二、训话，即给幼儿讲授一些浅近的道理和常识；三、幼稚园语，即对幼儿进行语言训练；四、日语，不要求幼儿书写，只学习认读；五、手技，相当于现在幼儿的手工，如积木、剪贴、泥工等；六、唱歌；七、游戏。园内设备齐全，“凡以资教养者皆备，如有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图书玩具陈列室等，并有幼儿户外活动场地，场地上有游戏山、游戏亭。

为了使幼儿园教育得到推广和发展，湖北幼稚园内后来还设立了女子学堂，招收 15 至 35 岁的女子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我国幼儿师范教育的最早尝试。据资料记载，湖北幼稚园的这些办园方法后来被端方的带到江苏。端方的于 1904 年调任江苏巡抚后，曾委托湖北幼稚园负责人去日本代聘“保姆”数位，购买幼儿园玩具、教具等，以便在江苏开办幼儿园，继湖北幼稚园后，全国各省才相继设立类似幼儿园。

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我国历史上的才女虽然很多，但从唐朝设状元始，到清末废除科举，历

代皇朝所点出的三百来个状元，并无一个是女的。

不过，我国历史上倒真有过一位女状元。太平天国时期提倡男女平等，从金四起义后就建有女官统率的女营，她们和男子并肩作战，立下过许多战功。定都天京后，又设置了自左右丞相以下的各级文职女官。为了选取有才干的女子参加行政工作，曾专门举行过女子科举考试。傅善祥为第一名。傅善祥是金陵人。20多岁，很有才华，考中后在东王杨秀清府里供职，有关政事文书，全由她负责处理，杨秀清十分满意。

世界最早的高等学府

2000多年前，汉武帝尊孔崇儒，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接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于公元前124年在京城长安创办“太学”，设置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弟子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多人。

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比欧洲在12世纪才兴办的大学，要早1000多年。

岳麓书院小史

坐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掩映于深山大壑、茂林修竹之中的岳麓书院，据史书记载，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实际创始时间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时期。据南宋学者、曾是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的记载，岳麓实际是在唐末僧人智璇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的。

从南宋到清代，代代有名：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熊锡龄、程潜等，更是岳麓高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毛泽东亦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杨昌济。似此一个学府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人才，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于寻找。

历史证明，岳麓书院，包括改制之后的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有它的突出地位的。

岳麓书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张栻主张岳麓要力纠时弊，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明确培养学生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治国安民；做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致君泽民”，使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倘从官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治乱和安危而言，张栻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岳麓书院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方针和方法。首先书院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首位。从张栻开始，几乎所有书院的山长都把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宋、元、明各代，均以“忠孝仁爱”作为校训，至清代，加上“整齐严肃”和“实事求是”，就形成了岳麓书院16字校训。如果说，在元代之前，岳麓书院还偏重于道德和知识的灌输，那

么，明清时期则更重道德的实践，重视行为规范。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至今嵌在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18条，除6条讲学习方法、态度之外，其余都是讲道德修养的。岳麓注重学生品德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勇于践行、关心民疾的经世济国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为正史立传者便有26人。

重视学生主体精神的培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是岳麓书院的另一个特点。南宋时期，张栻就提出“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的观点，认为“学思并进”才会使学生在受到教育的同时焕发创造精神。清代山长李文照指出：学生要有阙疑精神。总之，在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不但重视教的方面，而且更为重视学的方面，不只强调学什么，更强调学了之后的发明创造。

值得提及的是，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虽然，书院在总体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岳麓中传授过学术观点，其中有闽学、陆王心学、汉学，乃至近代新学等，即使是对立学派，书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从不闭门锁户。最为典型的是，清末康梁维新思想的进入。这些，不仅繁荣了岳麓书院的学术，更促进了岳麓教育的发展。岳麓学生思想活跃，见多识广，成功立业者众，是与此不无关系的。

近代以来中国各类学校之始

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布朗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创办的，学校是以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命名的，称马礼逊学堂。

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

最早的海军学校是清同治五年（1866）由沈葆楨在福建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时附设的求是堂艺局——福州船政学堂。

1876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内附设了我国第一家电报学校，学生从香港和广州招考，以及选调船政学堂的学生。学校以培养报务员为主，优秀学生可选送英国高级电报学校深造。这批学生毕业后，为1877年台湾电报的创办作出了贡献。

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是维新派于1889年创办的上海桂墅里女学堂。

我国最早的地质学校是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它原是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一个铁路学堂。

我国最早的农业职业学校是1896年2月创办于江西省高安县的蚕桑学校。

我国最早的铁路院校是1896年创建的山海关铁路官学堂。

近代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是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所设的师范院。

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创办于1898年，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我国第一所近代幼儿园是1903年秋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湖北幼稚园。

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复校的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森林专科学校。该校于

1908年2月在奉天省城（今沈阳市）大东关成立。该校设森林预科、本科及速成班。学制为五年。教师聘日本林学专家数人，分科教授。

1911年，学校与奉天农业学堂合并，定名为奉天官立农林学堂。

我国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是徐一冰（1881~1922）等于1908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

我国第一所艺术学校是刘海粟于1912年12月31日创办的上海艺术院。初更名为上海私立图画美术学校，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我国最早的高等地质学校是地质学家章鸿钊于1913年10月在北京创设的地质研究所。

我国最早的哑童学校是1914年在杭州创办的哑童学校。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革命的新型干部学校，1921年创立于长沙。

我国第一所话剧学校是1922年成立的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我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是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后更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古代的助学制度

助学制度，是伴随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大学，开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官学之先河。在官学求学的弟子可以免除徭役，还享受政府供给的食宿。汉代的学制和多种措施，均为后代所承袭。

除了官学以外，书院也是给予学生食宿的地方，书院兴起于宋代，它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向求学者提供食宿。

在清代以前，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仅是向学生提供食宿，尚未发现给予钱财的记载。清朝以后，由于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更为通行，开始出现了给银两的做法。给予学生的津贴费用，被人们称之为膏火。这种做法的出现，标志着延续至清的助学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传统的助学制度，特别是清代以来形成的膏火制，在近代的兴学中得到了突出的应用，也同时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历程。

1862年，早期洋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但当时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本该入馆的八旗子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入馆者“厚其薪水”，以膏火制吸引学生，此后在洋务派设立的所有学堂，均实行这样包括膏火制在内的助学制度。这在扩大招生人数、考勤和奖励等学堂管理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1897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规定只给学生伙食和日用品，废除膏火制，这一项重要变革，标志着近代新式学堂在学校组织上向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过数十年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宣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在全国设立有初等、中等、高等学堂，并有相应的实业、师范在内的统一的学校系统，还规定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不交学费外，其余学堂的学生必须交纳学费，并废除膏火制，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助学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束。

魏徵人才观探究

“知人善任”和“选贤任能”，是魏徵向唐太宗讲谏的指导思想。魏徵深知，国家官吏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政局的安危。他说：“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任恶人则国乱。”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向唐太宗讲谏，要把忠正贤良、廉洁奉公、才华出众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位置上来。但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区分出“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诈”、“善人”与“恶人”实属不易。为此魏徵针对唐太宗一时在择官用人方面存在的“蒿兰同臭，玉石不分”，“用人不善”，“赏罚不明”的问题，在贞观十一年与十四年向唐太宗先后进奏了《论君子小人》、《论御臣之术》两篇著名疏文，陈述了他的人才观。魏徵认为：现在的群臣中，具有品德廉洁、才能卓越的人是很少的。原因有二：一则是由于国君从爱憎出发，使贤邪混淆；二则是由于朝廷对他们要求不严，表彰奖励还不够精细的缘故。如果国君对待群臣能够“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再加上“勗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即是说，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就能引导他们“得行其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出应有的贡献。

魏徵观察人的基本方法是：“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即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以及贫贱时的所作所为。魏徵在这里列举人才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非常实际的。

魏徵认为：一个国君，如果真正要想全面了解每个官员思想品德的内涵及本质，做到“知人善任”、“选贤任能”，必须要首先能划清“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臣”、“善人”与“恶人”的分类界限。那么，分类界限又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呢？魏徵在贞观十四年向唐太宗进奏《论御臣之术》的疏文里，引用汉朝人刘向编著的《说苑》关于“六正”、“六邪”人物评鉴之说，作了明晰而又肯定的回答。“六正”人物的标准是：“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论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历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寒期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谏，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六邪”人物的标准是：“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善，主所为皆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谲，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嫉善妒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物理，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令，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魏徵认为：人臣的行为有“六正”、“六邪”的区别。“行‘六正’则

荣，犯‘六邪’则辱”。所以魏徵把处于封建帝王时代的人臣，根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所谓的“君子”与“小人”，“忠良”和“奸诈”，“善人”与“恶人”的行径来分别划归为“六正”与“六邪”两大类，正邪各有六种，作为考核、任用、教育官吏的“权衡”、“绳墨”、“规矩”，是对每个官员“审访其行”以后客观而又公正的政治结论。这无疑对唐太宗在贞观时期选拔德才兼备的干练官员从思想认识上作好了准备。

古代的“圣人”

至圣孔子 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自此以后，他的学说成为两千多年中封建文化的正统，故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号称“至圣先师”。

亚圣孟子 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著有《孟子》一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正宗继承者，并称“孔孟”，被尊为“亚圣”。

史圣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的作者。

诗圣杜甫 字子美，号少陵，河南巩县人，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的《三吏》、《三别》。因为他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所以被尊为“诗史”、“诗圣”。

词圣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宋代著名的词人、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词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以往的词内容狭隘，他扩展了词的内容。他写的词，笔力纵横，豪迈奔放，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被尊为“词圣”。

文圣欧阳修 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水（今属江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说理通达，抒情委婉，主张“明道”致用，反对靡丽形式的文风，并积极培养文坛后进，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人尊他为“文圣”。

书圣王羲之 字逸少，人称“王右军”，东晋山东临沂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了隶法的形迹，达到了独立完美的境地。人们赞美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公认他为“书圣”。

草圣 张芝，汉朝书法家。他擅长草书，对旧隶的草体造诣更深。

画圣吴道子 名道玄，唐代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他的画立体感很强，擅长画人物，用朱粉的厚薄来表现骨肉的高低起伏，如同塑像—样真实。又善于画佛像，形象逼真，人物的衣带子飘飘若飞，有“吴带当风”之誉，后世尊他为“画圣”。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南阳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书，被称为《医经》。书中阐述的“辩证论治”的中医理论和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尊他为“医圣”。

药圣李时珍 字东璧，号濒湖，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花了27年的艰苦努力，写了一部190万字的《本草纲目》，

书中共收录了 1892 种药物。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被尊为“药圣”。

茶圣陆羽 字鸿渐，号东冈子，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撰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所以后人誉他为“茶神”、“茶圣”。

酒圣 杜康，即少康。古代传说中酿酒的发明者。

第三章 图书、报刊

编辑之祖：孔子

我国古代的编辑工作是从编辑书籍开始的，书籍是编辑工作的直接产物。因此，我国最早的编辑工作当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他编辑的“六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书籍。史称孔子作《春秋》，故孔子为史学之祖；而孔子编“六经”，故孔子理应为编辑之祖。

编辑工作应有特殊的涵义，即对原有的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古代最初的编辑工作即是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殷代既未有正式书籍出现，那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编辑工作。即一步说即使殷代的“典册”断定它就是简册，但也不能笼统地把简册都当成书籍。虽然书籍的最初形式是简册，但如果它仅作为历史档案编次保存，那它们属于文献资料范围，还不是书籍的独立形态，只有作为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知识的简册，才能算做真正的书籍，而这样的简册书籍，必然要经过编辑者有目的的整理、加工后才能产生的。孔子整理、编辑“六经”，确实是有根据的，《论语》、《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还散见于汉以后的有关著作中。

“孤本”种种

所谓“孤本”，就是世上仅存此一部的书。这类书有的虽曾刻印过，但已经绝版，如唐欧阳洵所辑、宋刻《艺文类聚》。有的书成后，未刻印，只手抄存世。如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解缙等人所编，因卷帙浩繁，付刻不易，当时只抄录正本贮皇史（chéng，音成，即藏书室）。有的仅存手稿，如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京州府志备考》。如此等等。

总的来说，年代较久远，尤以明代以前为世所罕见而又具有相当的资料文物价值的书，其中有不少已成为孤本。

由于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为人所重。正因为此，有的人不惜假造“孤本”。如晋代张湛，就曾缀集一些旧书的材料造出了一本《列子》，冒充“孤本”还有的人千方百计骗取别人所藏孤本，以欺世盗利。如刘禹生的《世载堂杂忆》就载有这样一件可笑可鄙的事，杨守敬住在武昌的时候，藏有宋刻大观年间的《本草》一部，因为这书是孤本，价值昂贵，引得邻居柯逢时眼馋。一天，柯谎称可以高价代售，只希望先借他看一昼夜。杨守敬同意了。柯逢时将书带回家，动员全家人，一夜之间把书全抄了下来，第二天将书还给杨说：“为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后，书肆上果然有《本草》出售，杨这时才知道上了柯的当，因此，“恨之刺骨，至移家避道，终身不相见”。

与此相反的是近代藏书家丁福保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道。据郑逸梅老先生《艺坛百影》（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说：“丁爱藏书，凡他家藏的孤本、珍本，有耆宿借阅，他总是一一借出。解放后，他又将十余种孤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还请侯晔华绘‘捐书图’，他自己撰记。”这种高尚风格是古来少有的。

宋版书何以贵重

在古籍中，宋版书特别为藏书家所珍视，因此很贵重。为何如此呢？原来它有以下特点：

1. 校刻精：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错误，如错字、掉字、增字、重复等情况都有，不加以校勘，就会失真。而宋代读书人、刻书人都非常重视校勘工作，有不少校勘名家，如宋敏求，“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又如马端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所藏书，“皆亲自校讎、分类精当”凡出自这些名家校讎的书，都被人视为“珍宝”。

2. 刻工佳：宋代刻书的地方不少，尤其是浙江的杭州，人文荟萃，良工毕集，刀法首屈一指，连皇室刻书，也多到杭州雕版，以后杭州成为了南宋的首都（当时名临安），刻书更为有名，刻印的书籍，十分精美。

3. 书写好：一般都用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字体。他们的字体苍劲有力，秀雅生动，为人们所崇尚，宋代刻书人多以他们的字体刻书。

4. 纸墨良：宋人印书多用楮纸、竹纸。这种纸质地优良，白洁如玉，两面都光滑；墨的色泽鲜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有香味，翻开书页，香气扑鼻，历代都不如。

5. 印书行幅、款式也很讲究，为人称道。

由于有这些优点，所以一向为后代读书人所重视，就是翻刻古书，也以宋版书作底本，以免失真。可惜宋刻书流传下来的很少，明代以后就很少见到宋刻书了。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毛晋，可说是个“宋书迷”，为了买到宋版书，不惜重价收购，到处收罗，其至以页论价。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经，不如卖书与毛晋。”可见其喜爱宋刻书的程度。

四十年出版工具书知多少

新中国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取得了重大成就，最近 10 年来更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8 年底，全国共出版工具书 4031 种，其中辞书工具书 2815 种，非辞书型工具书 1216 种。我国工具书的出版，基本上已做到门类齐全，品种丰富，成龙配套，形成了系列。最近几年出版了 2832 种，占 40 年出版品种的 70%。

《新华字典》是建国后第一部新编辞书，自 1953 年问世以来不断修订再版，迄今已发行一亿数千万册。起始于 50 年代的“三大工程”——《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于 70-80 年代相继完成，大型语文辞典《汉语大词典》正陆续出版，《汉语大字典》（共 8 卷）已出齐。代表国家科学文化和辞书水平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 74 卷），出版接近尾声，1993 年出齐，受到国际上的瞩目。

地图属于图录类工具书，品种颇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世界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等普通地图外，还有中小学教学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土壤、旅游、乃至恶性肿瘤等专门地图出版。文物、美术图录为数甚多，像《中国博物馆》、《中国石窟》、《中国美术全集》等，都属于世界水平的内容丰富、印制精美的豪华本。

手册和年鉴一类工具书，是最近 10 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热门书，头 26 年

只出版了 85 种，近 10 年则增至 538 种。

鉴赏辞典的勃兴虽只几年，出书品种和印数却相当多。从上海辞书出版社于 1983 年出版《唐诗鉴赏词典》以来，一系列诗、词、散文乃至新诗、音乐、书法等等鉴赏辞典接踵问世。如中国书籍出版社于 1989 年开始出版的《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等。此外，年表之类的书约 110 种；索引之类的书约 330 种。

国际标准书号与中国标准书号

我国近年出版的图书上，“全国统一书号”的字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ISBN”字符及几组数字。

“ISBN”是国际标准书号的缩写，是目前国际通用的图书编码系统。

ISBN 是英国人福斯特设计的，1972 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为国际标准。目前，西柏林有一个国际 ISBN 中心，负责世界范围的 ISBN 编码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现在已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系统，采用 ISBN 进行图书编码。

国际标准书号以“ISBN”作其标志，后面带有十位数字，分成几组。组号代表出版者所隶属的国家、地区或语种等，由国际 ISBN 中心根据各国图书出版量等因素颁给。中国为“7”。出版者号由各出版者所隶属的国家或地区的 ISBN 中心颁给。组号和出版者号共同组成了出版者前缀，它是每个出版者在国际上的唯一识别标记。如我国的人民出版社的标志为“7-01”，书名号由各出版者给定。每种不同的出版物，包括不同版本、不同装帧等，都有不同的书名号。

我国于 1982 年成立了中国 ISBN 中心，并加入了国际 IS - BN 组织。1986 年 1 月，我国颁布了中国标准书号，使用于图书、画片、盲文、缩微、声像、电子类出版物，以及微型计算机的软件等。原中国国家出版局规定，从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所有正式出版社从图书的征订目录到版本记录一律采用 ISBN 编码，原来使用的全国统一书号停止使用。

例如《中国外交史 1949—1979》一书的标准书号为“ISBN7 - 215 - 00090 - 7/K · 27”，其中“7”为组号，代表中国，“215”是河南人民出版社，“00090”是该书的书名号，“7”是检验号，“K · 27”表示第 27 种历史类书籍。ISBN 国际标准书号科学合理，结构简单、清晰，唯一性强，包含量大，便于计算机检索和处理。

采用 ISBN 系统，不仅能对图书馆的分编、流通带来便利，尤其用它作为征订目录，可以大大降低重复购书的比率，此外，还可以使人们对非法出版物增强识别能力。

序称种种

“弁言”：弁，古代的一种帽子，因谓书籍冠于卷首相当于前言或序文一类的文字为弁言。

“绪言”：发端之言；已发而未尽的言论。今多指著作前概述全书大旨或说明作书经过和意图的部分，也叫绪论。

“导言”：“导”，即引导的意思，因为导言是为了引导读者了解书的

主要内容或者写作经过，故又称“引言”。导言都是作者自己写的，而且多适用于理论、学术著作。

“代序”：指代他人作的书序，或本非书序之体，而置于正文之前以代替书序的文章。

“前言”：说明写作的目的、经过和资料来源、编写体例等的文章多称“前言”，也称“前记”、“前面的话”、“开篇的话”、“写在前面”等，出版社所写的“出版说明”有时亦用以代替“前言”。

“引”：在叙事抒情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在矛盾冲突展开之前，对人物的历史，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先作的交代或提示的文字一般叫“引”，也称“引子”。“序”称“引”溯其源与避讳有关。原来唐朝以后，因为诗人刘禹锡的父亲名叫刘绪（“绪”同“序”谐音），宋代散文家苏洵的父亲名叫苏序，他们二人为了避父名讳就改“序”为“引”，如刘禹锡写的《彭阳唱和集引》、《吴蜀集引》，苏洵写的《族谱引》。由于刘苏二人在文学上的影响，人们也开始称“序”为“引”，并有人也做起“引”来，如刘天华的琵琶曲《歌舞引》。

“楔子”：本是插在木器榫缝里的木片。戏曲中的“楔子”始于元杂剧，大多放在全剧的前面，作为剧情的开端；也有放在折与折之间的，如近代现代戏的过场戏。小说中的“楔子”始于七十回本《水浒传》。金圣叹把原本《水浒传》的“引首”和第一回合并改称“楔子”，为后世小说沿用。

“入话”：在古代话本里把“引子”称为“入话”。

“序曲”、“序幕”：歌剧、清唱剧等开场音乐称“序曲”；多幕剧的每一幕前用以介绍剧中人物的历史，剧情发生的起因，预示全剧主题的文字称“序幕”。

“垫话”：曲艺节目中，相声演员演正式段子之前的开场白叫“垫话”。

“开词”：评话演员说正书前先诵的一段词称“开词”。

“开篇”：浙江一带的评弹，在演出前附加的唱段称“开篇”。

“书帽”：快书、大鼓的正式节目前加演的小段叫“书帽”。

中国古籍书名的含义

每本书的书名都有一定含义，我国古籍书名含义颇多，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直接用著者姓名作书名，如《孟浩然集》。
2. 以著者的字作书名，如《李太白文集》（李白字太白）。
3. 以著者的号作书名，如欧阳修有《六一词话》（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李卓吾评水浒传》（卓吾是明代李贽的号）。
4. 以著者的斋室名作书名，如《小仓山房集》。清代袁枚曾给自己书斋取名为“小仓山房”。
5. 以著者籍贯作书名。如柳宗元，河东人，故其集名《河东先生集》，宋代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他的集就叫《王临川集》。
6. 以著者官职作书名。如唐代诗人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他的书取名《杜工部集》。
7. 以著者的谥号作书名，如《欧阳文忠集》（宋代欧阳修谥号文忠）。
8. 以帝王年号作书名，如《康熙字典》。

- 9.以朝代书名，如《唐史》、《宋史》。
- 10.以书的体裁为书名，如《徐霞客游记》。
- 11.以涉猎的地区作书名，如《苏州府志》。
- 12.以撰书之地而为书名，如杜牧《樊川文集》，沈括《梦溪笔谈》。
- 13.以成书的时间命名，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长庆为唐穆宗年号），再如《癸巳类稿》，《丙辰札记》。
- 14.以其所寄寓的情调命名，如《听雨丛谈》、《闲情偶寄》。
- 15.以前人佳辞名句点化而来，如清袁枚有《子不语》。
- 16.以反映学科内容作书名，如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一句话评古书

- 《诗经》——先民的歌唱。
- 《左传》——诸侯争盟记。
- 《山海经》——神话的故乡。
- 《楚辞》——泽畔的悲歌。
- 《孙子兵法》——不朽的战争艺术。
- 《盐铁论》——汉代财经大辩论。
- 《天工开物》——科技的百科全书。
- 《老子》——生命的大智慧。
- 《墨子》——救世的苦行者。
- 《史记》——历史的长城。
- 《庄子》——哲学的天籁。
- 《荀子》——人性的批判。
- 《战国策》——隽永的说辞。
- 《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
- 《颜氏家训》——一位父亲的叮咛。
- 《老残游记》——帝国的最后一瞥。
- 《聊斋志异》——瓜棚下的怪谈。
- 《三国演义》——龙争虎斗。
- 《红楼梦》——失去的大观园。
- 《儒林外史》——书生现形记。

古籍的体例

古籍各有体例，我们在阅读时不能忽视。

作者：远古的书一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如《诗经》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无名氏所作。先秦以及后来的书名常题某子，其中一些是后人将同一学派的著作汇集到一起，署其学派代表人物的姓为书名。汉代以后，作者署姓名多了，有的连字号、籍贯、官职、封号、爵名和著作方式都标出来，如《曹子建集》署名：“魏陈思王曹植撰”，魏表示年代，陈是封地，曹植曾被封为陈王，思是他的谥号。也有的古书署别号。

书名、序和目录：古代的书名有作者自取名，也有后人将单篇汇集成册时加上去的。古人取书名，或取书中首句二三字为书名；或依书的内容取名；

或以字、号、籍贯、官爵、谥号、年代和书室等命书名。如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是他的书室名。古书的序，或写作“叙”，有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也有别人作的序。古书的序原来放在书最后，两汉以后才放在著作的前面。古代的著述最早多数是单篇，当然没有什么目录，后来在编成书时，或校书后就列出目录，一般都放在书的前面。最早一书目录是《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汇总了六十四卦名。最早的群书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整理编制的《兵录》。

篇章：古书怎样分篇章？有的因内容不尽相同而分内外篇，有的因篇简繁多、或旨趣有别而分上下篇，还有的因为文章气势不同而分上中下三篇。如贾谊的《过秦论》。

注释：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避讳：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书名甚至物名，常因避讳而改动。其避讳涉及的范围广，种类也很多，如唐高祖名渊，有的书改陶渊明为陶泉明，又如晋简文帝母郑太后小名阿春，故改《春秋》书名为《阳秋》等等。其采用的方法，大都以同音、同义或近音、近义的字代替，也有用缺笔画或空字的办法。

解释古籍的常用方法

- 释：解释其义也（如刘熙的《释名》，解释名物的意义）。
- 传：传说往古之事，使人知也（如孔安国《尚书孔传》）。
- 训：顺也，顺其意以释所言之理也（如扬慎《檀弓丛训》）。
- 诂：训故言也，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如阮元《经籍纂诂》）。
- 笺：表识之也，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也（如程际盛《骈字分笺》）。
- 注：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也（如王弼《易注》）。
- 疏：疏解注旨而申论之（如沈重《周礼义疏》）。
- 解：对于难意及字句之剖析（如范宁《谷梁传集解》）。
- 义：推阐经籍古人之说（如杜道坚《文子缙义》）。
- 诠：训释字义（如玄奘《唯识三十颂诠句》）。
- 论：辨析古籍事理之含义（如黄宗羲《易学象数论》）。

《论语》与《圣经》之比较

《论语》与《圣经》一个出现在东方的中国，一个形成于西方的古罗马

帝国，对东西方的文化影响颇深，两书都形成于动荡的年代，且春秋时代与罗马时代的水准相差并不遥远，故两书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常道德；都以别人为本位，把己放在次要、从属地位；都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都承认社会上现行的私有制度和贫富现象，但常流露出一种早期的平等观念；书中的主人公既富于人情味和现实性，又是理想人格的，等等。但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不同，两书又有许多差异，如两者的中心观念不大相同，一为“原罪”，一为“仁”。《圣经》将人们的希望引向尽善尽美的彼岸，而《论语》更注重现实世界。《圣经》中，信仰压倒一切，《论语》更强调人生的经验。《圣经》倡导一种类似禁欲主义的精神，而《论语》则以人本身为目的，主张有节制、谨慎地追求对于身心有益的乐趣。《圣经》显现着一种大起大伏、激烈冲突的色彩，《论语》则蕴含着一种中庸平和的基调。就平等观念而言，《圣经》中的平等意识较强，《论语》在平等观念之中，又掺合着大量的等一类的观念。《圣经》与《论语》差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在风格、精神方面的巨大差异。

《文心雕龙》趣事

刘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他出身贫寒，好学上进，年轻时就下苦功写成了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名人的指教。后来，他几次求见当时的大文学家沈约，都被拒之门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卖书郎，带着一个大包裹，整天在沈约家门前盘桓，等待时机。

有一天，刘勰正好瞧见沈约乘车回家，连忙迎上去，放开嗓子高声喊道：“卖书！卖书！都是古装珍本哟！”沈约是个书迷，听说卖好书，便立即吩咐家人停车，想看个究竟。刘勰乘机呈上自己的作品，说：“沈大人，这里哪有什么珍本，只因小人写了一部书，一直得不到大人的指教，才化装成卖书郎在此等候。”沈约听后，不仅没有生气，还把刘勰请到家里。

沈约读完刘勰的作品后，发现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对刘勰热情地鼓励一番，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刘勰按沈约的意见，将文稿认真作了修改。这便是后来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名著《文心雕龙》。

第四章 语言、文字

“汉语”与“中文”的区别

“汉语”是“中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汉语”是汉族语言的简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除汉语以外，尚有满、蒙、藏、朝鲜、维吾尔等兄弟民族语言，通常说的汉语，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包括使用汉语地区的方言。由于汉族人数众多，使用汉语的地区广阔，汉族文化历史悠久，汉语自然成为我国的主要语种，也是历代的官方语言。

“中文”是中国语言的简称，它与“汉语”的区别严格来说，汉语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中文”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问题。

“普通话”名称的由来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一个新名，叫“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久，就有人反对。1931年，瞿秋白曾反对“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成了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 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或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听作“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5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

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甘（“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2月19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时齐兵”误所为“10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 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统。春秋旧中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雅言”。《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著《方言》，记录了2000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广全国，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音作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怀麓堂诗话》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作基础来确定。1926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说用典故

典故，古人也称典故，或称古事、故事、故实、古典、典实、旧典、往典等等。在诗文中运用典故，古书上也有不同的名称，一般称为用事，也有称为引事、隶事、使事、运典等的，我们今天一般就称用典了。

“事典”与“语典” 什么是典故呢？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由古代故事构成的典故，称为“事典”；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构成的典故，就称为“语典”。

事典所用的古代故事中，最大量的是历史故事。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几句，就是连用苏瓌不失节而还汉；黄公（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避秦入商雒山中；穆生因楚王戊忘设醴酒而离去；邹阳狱中上书以自明四个历史故事（均见《汉书》），借以表明李白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是出于对唐王朝的忠心，他决不跟随李璘谋叛，因而他被流放夜郎完全是冤案。

事典也有用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小说、戏曲等故事的，如李白《把酒问月》诗：“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用的是神话故事。韩愈《感春四首》之四：“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霜白趋埃尘。”就用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汪元量《钱塘歌》：“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用的是杜甫《杜鹃》诗：“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语典所用的是古书中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如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后代因称十五岁为“志学之年”，三十岁为“而立之年”，四十岁为“不惑之年”，五十岁为“知命之年”，六十岁为“耳顺之年”，七十岁为“从心之年”。这里所取的是有特殊意义的词语。这种情况，在语典中是随处可见的。此外，也有取专有名词的，包括人名、地名、宫殿名、篇名、典制名、官职名等等。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轮台”为地名，在新疆，汉朝曾在那儿驻兵屯田。陆游诗中代指南宋边疆。

词典也有取格言、警句、俗语、诗文句的，如杜甫《哭王彭州抡》诗：“翠石俄双表，寒松竟后凋。”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无论事典或语典，特别是事典，同是一个典源，在不同的诗文中，可用许多不同的词语来概括。如《韩非子·和氏》篇讲和氏献璧的故事，后人作典故使用时用词可谓千变万化。因和氏所献的是未理的璞，经加工后才成为璧，璧也就是玉，成为著名的宝物。因之在诗文中使用时可用“和璞”、“和璧”、“和玉”、“和宝”。又因和氏姓卞，就可用“卞”代“和”，成了“卞璞”、“卞璧”、“卞玉”、“卞宝”。因和氏为楚人，又可用“楚璞”、“楚璧”、“楚玉”、“楚宝”。楚又称荆，也就可称“荆璞”、“荆璧”、“荆玉”、“荆宝”。又因璧得之于楚（荆）山中，故也可称“楚山璞”、“荆山璞”等。或者干脆称为“和氏”等。

事典如此，有些较长的语典也是如此。如曹植《名都篇》有“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后代常用作饮美酒的典故，如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辛弃疾《玉楼春·再和》：“十千一斗饮中仙。”

典故的用法

典故在古诗文中有种种用法，这里只就主要的用法略作介绍。

正用和反用。正用就是取典故的原来意义入诗文；反用则在诗文中反用原典的意义。如上举和氏璧的典故，在使用时往往表现了对和氏不幸遭遇的同情，如李白《鞠歌行》：“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这是正用。但李商隐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中却说：“却羨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说自己反而羡慕卞和被刖去双足，免得继续作一小吏，受到阶前逢迎奔跑的耻辱。这是愤激之词。又如“求田问舍”一典，本来是刘备批评许汜在天下大乱时，无忧国志家的救世之心，而只求买田置地，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见《三国志·陈登传》）。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说：“求田间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是正用。而王安石在《读蜀志》中却说：“无人说与刘玄德，问舍求由意最高。”这是反用，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的苦闷与愤激。事典有反用，语典也常见，如王安石《钟山即事》：“茅簷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反用了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意。这种反用，往往在大家熟悉的典故中，语出意表，惊人耳目，受到后人称道。

明用和暗用。明用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典。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就是。暗用则并不点明，不让人感到是用典，当然，熟悉典故的人就能看出来。如柳永《八声甘州》：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暗用了谢朓《之宣城郡山新林浦向板桥》诗的“天际识归舟”句。又如《长生殿》第三分：“全凭仗金投暮夜，把一身离阱穴。”暮夜投金。显然是指黑夜行贿，但也是暗用了《后汉书·杨震传》的典故。杨震新任东莱太守，“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之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借用。构成借与被借的关系是，被借典故的原意和诗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干，但它们之间也有某一相关的地方。如《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王叔和是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经》。文中用人名代医书。这种借用法，诗文中用得相当普遍，上面说的“借词”也就是“借用”。

化用。指用典时不是直用典故，而是把原典灵活地加以融化、点化。这是为历代称道的一种用典法。这里仅举古诗词曲中常见的化用前人诗句例，如苏轼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常被后点化用来写西湖。诗如聂大年《西湖景十首·雷峰夕阳》：“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词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曲如薛昂夫《苦雨》：“西湖也怕西施妒，天也为他巧对付。晴，也宜画图，阴，也宜画图。”

古诗文中还有一句中连用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典故。二典有并列关系的，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萤窗”用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雪案”用孙康映雪读书的典故。也有二个以上典故糅合运用的。糅合后，后起来像一个典故，如李商隐《西南行却寄相送者》：“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陈仓碧野鸡”含有二个有关鸡的典故。据《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于陈仓祀鸡神陈宝。又《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诗中把陈仓的陈宝神和益州的金马碧鸡神糅合在一起了。

为什么古人那么爱用典，而且长久不衰？这除了科举考试和言文分离等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好的用典，在抒情达意上，实有助于诗人的表达。

俗话佛源十一例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2000年来绵延不绝，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无不受其影响。甚至，我们的日常口语，也有许多是从佛教里来的。

天花乱坠 由佛经故事“天女散花”衍变而成。“佛告文殊师利，汝诣维摩诘问病时，维摩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以天女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而为供养”（《维摩经》）。后来形容讲经说法，感到神天，天花纷纷坠落。如《心地观经·序品》：“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遍虚空。”后多指言谈虚妄，动听而不切实际。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聚徒一千二千，说法如云如雨，讲得天华（花）乱坠，只成个邪说争竟是非。”

一尘不染 尘，在佛教中有二义，一是梵语 rajas 的意译，是极微小的物质，也译作“微尘”，是原子的意思。二是梵语 visaya 的意译，可译为“境”、

“境界”，即感官认识和意识的对象，名为六尘，例如色、声、香、味等等。佛教认为这些“尘”或“境”对认识的主体能产生“染”（污染）的作用。这些对象（尘）的各种组合构成不同的烦恼和世间现象，佛教往往把它们喻为尘劳、尘世等。不为尘世等现象所污染，叫作一尘不染。后多用以形容清净纯洁，或不受坏习气的沾染，引申为清高廉洁。

世界 梵语谓路迦驮都，原意为日月照临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亦含有地狱、天上等领域）。又泛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流迁意，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含方位意，指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空间。《楞严经》：“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现在常用时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一丝不挂 佛教用来比喻不受尘世的丝毫牵累。原作‘寸丝不挂’。《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与陆亘问答：“陆异日又谓师曰：‘弟子亦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陆云：‘寸丝不挂。’师云：‘犹是阶下汉。’”黄庭坚《寄航禅师诗》：“一丝不挂鱼脱渊，万古同归蚁旋磨。后亦形容赤身裸体。

三生有幸 三生，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三生有幸，形容极大的幸运。《传灯录》：“有一省郎，梦至碧严下一老僧前，烟穗极微，云：此是檀越结愿，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明皇明剑南安抚巡官。第二生，宪皇时西蜀书记。第三生，即今生也。”

野狐禅 学道而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悟，禅家一概斥之为“野狐禅”。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昔有一老人，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答曰：“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为野狐身。后承百丈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遂脱去野狐身（见《五灯会元》卷三）。原来，佛教的“修因证果”，正是因果律的体现。老人以为修行人可以“不落因果”，恰恰陷入了“邪见”，属于“大妄语”，结果受了“野狐身”之报。又有个瑞岩和尚，整日价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宋·慧开批评他误把“识神”认为“真心”，是“野狐见解”（《无门关》）。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醍醐灌顶 “醍醐”是从牛乳中反复提炼而得到的甘美食品。印度人不但视为“世间第一上味”，而且认为它有较强的药用价值。佛教堂用“醍醐”比喻“无上法味”（最高教义）、“大涅槃”、“佛性”等。至于“灌顶”，原来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的仪式：取四大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四海”的统治权力。密宗沿用此法，在僧人升任阿闍黎（规范师）时，“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见《大日经疏》卷十五）。后来，诗文中多以“醍醐灌顶”比喻通过智慧、启迪，除却疑虑，从而心地清凉。如白居易《嗟落发》诗：“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又如《西游记》第三十一回：“那沙僧一闻孙悟空三个字，便好似醍醐灌顶，甘露滋心。”

婆心 “婆心”即“老婆心”之略，源出禅门。有些禅师诲人不倦，絮絮叨叨，犹如老婆子绕舌，丛林中称为“老婆心”或“老婆禅”。“老婆心切”，动机未必错，而效果未必好。大慧禅师说：“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虽然苦口叮咛，却似树头风过。”（《五灯会元》卷十九）“老婆心”

好比葛藤纠缠，不符合禅宗“单刀直入”的宗风。大慧自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大慧语录》）元·耶律楚材《请智公尼禅升堂疏》谓：“本有丈夫志，不学老婆禅。”按，佛名“调御丈夫”，说法如“狮子吼”，正与“婆心”相反。今演为“苦口婆心”，意谓反复叮咛，语重心长，是个褒义词。

当头棒喝 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用心即乖。为了打破学人的迷执，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有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临济录》）雪峰禅师曾说：“我在德山棒下，似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圆悟心要》卷三）颇有切肤之痛。“喝”当始于马祖。百丈禅师回忆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黑。”（《景德传灯录》）最善于“喝”的，莫过于临济义玄，他有四种“喝”法，门下“棒喝交驰”。“德山棒，临济喝”，留与禅人作模范（《五灯会元》卷十七）。遂成为禅林的风气。后以“当头棒喝”、“当头一棒”泛指警觉迷误。如《镜花缘》第八十四回：“这个笑话虽是斗趣，若教愚而好自用的听了，却是当头一棒，真可猛然唤醒。”

实际 在佛教中，“实际”一词与法性、真知、实相、法界、涅槃等含义基本相同，指唯一绝对，常住不变的本体。“实际”无所不容，无处不在，一切现象都是“实际”的显现，故亦名“实际海”。《大理度论》卷三二谓：“实际者，如先说，法性名为实，入处名为际。”隋·慧远《大乘义章》卷一解释：“实际者，理体不虚，目之为实；实之畔齐，故称为际。”“际”犹边际，在“实际”中指特定的范畴而言，用法与“法界”之“界”相同，北魏《中岳嵩阳寺碑》云：“化息双林，终归实际。”此处“实际”当指“涅槃”。“实际”演变为今天的常用词，有两层意义。一、指事实，即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如不切实际，又如从实际出发。二、指实践，如理论联系实际。

无事不登三宝殿 所谓“三宝殿”，是指佛教的三个（佛、法、僧）活动场所。“佛”是指佛教信徒“大众登场蒞事”的地方，不准随便登门游览；“法”是佛家“珍藏经典”之所，也不能擅自进去“玩视”；“僧”是指和尚“燕息”（睡觉）的“寂静禅房”，门外更是经常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平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出于此。

此外还有“不可思议”（指思维和言语都不能达到一种境界）、“单刀直入”（指佛法学习时，认定目标勇猛前进）、“不即不离”、“心心相印”、“现身说法”、“因果报应”、“盲人摸象”、“衣钵”、“一弹指”、“回光返照”等，这些佛家语丰富和发展了汉语，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俗语扫瞄

俗语，作为一种口头流传的、形象的、定型的语句，是人民群众的口碑，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几乎人类社会文明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它摄取的“镜头”，或赞扬，或批评，或进谏，无不出自肺腑。俗语在历史上名称繁多，如称俗言、俚语、俗谚、古谚、谚语、鄙俚词、恒言、常语等。俗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谚语、俚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俗语这一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寓意型，

如：“人心不足蛇吞象”、“拆东墙，补西壁”、“睁着眼睛说瞎话”；二、说明型，如：“十个指头有长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兵糊涂一个，将糊涂一群”；三、形容型，如：“一个针尖，一个麦芒”、“蚂蚁啃骨头”、“宰相肚里好撑船”等。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的。

俗语与格言、歇后语、常用语、惯用语以至方言土语、标语、口号之间，存在互相转化、借用的现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句式自由，可长可短，没有固定格式。但俗语顾名思义更加通俗，较少文气，因而更灵活、通行，更具风趣幽默和俏皮，也更擅于描摹世态风情。像“打肿脸充胖子”，“猪八戒打一耙”，“偷鸡不着蚀把米”，这种把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俗语，诙谐有趣，也增加了表达的表现力量。

俗语虽在社交场合和文学作品中却随处可见，被大量运用。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被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中，顿觉风采、典雅起来；“借酒消愁”入了李白的诗，成为“举杯消愁愁更愁”，内涵更丰富了。也有相反的情况，古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流入民间成为俗语，如：“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均载于先秦诸书，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这句意境优美的诗，现在则被当作鞭挞一种不合理现象的俗语而流传了。

有的俗语，因使用场合不同和语气的变换，褒贬意思完全两样，有的则因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作用大不相同了。比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既可作为寄予希望之词，也可喻为没有长劲。又比如说某某“人老心不老”，可解释为此人老当益壮、老骥伏枥；换一种场合和语气，会看作此人不识时务，这大把年纪还事事占强。而“吃不了，兜着走”，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挖苦人、嘲弄人的俗语，可是某餐馆为了杜绝浪费现象，动员顾客将未动过的美肴带走，并给顾客备有简便卫生的包装袋，这一倡议顿时受到欢迎。于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句俗语一下由“贬”变“褒”，生成出新的涵意。在重农轻商的时代，“万事农为本”这句话很吃香，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人们又实践中总结出“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技术不富”这样带有经验性的话。

近几年不断出现新的俗语，如一阵风刮来，不胫而走，虽不知从哪儿开始产生，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请看俗语中对种种不正之风的无情揭露：“上梁不正下梁歪”；“吃人的口短，拿人的手软”；“上班一杯茶，下班抱娃娃，心怀小九九，嘴里喊四化”；“酒杯捏扁了，筷子掰短了，椅子坐散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午后，吃了中饭车马炮”；“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喝混日子”；“盯的是票子，谋的是房子，保的是位子，为的是孩子”；“点上稀客，面上游客，桌上常客，灯下扑克”；“孩子孩子你快快长，趁着爸爸当着长，要是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党委书记讲理想，厂长经理包和奖。搞生产靠阿乡（民工），正式工人白相相（玩）”；“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抽支烟不管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不办事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品权力化，权力商品化，国家一化也不化”；“想致富，掘坟墓。要发财，使劲挖。深挖洞，广收货。工农知学干，全民玩破烂，你挖我倒他出境，‘生产自救’有门路”……何等分明的爱憎，何等犀利的言词。

此外还有一些俗语令人深思，如“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打死也不去街道”；“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上有政策，下对策”；“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三盯着钱，老四上街喊……老九上了天”；“50年代人爱人，6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小伙姑娘找对象，美国、日本再西洋，老夫少妻新潮流，到了国外包福享”。

吉语寓意趣谈

吉语是我国成语词中的一部分，民间称其为“讨口彩”、“讨吉利”。它语句通俗，内容含蓄，形式独特，易懂好记。

吉语在人们衣、食、住、行诸方面得到大量应用。在民间剪纸、年画、蓝印花布、民族服饰等工艺品上，都以吉语为主题，通过描绘各种物象来表达吉语寓意。如以蝙蝠、绉带鸟、如意、灵芝组成的吉语称为“福寿如意”；把寿字写成圆形的篆书，五只蝙蝠围绕四周的吉语视为“五福（蝠）拜寿”；以爵、鹿、蜜蜂、猴子组成的吉语称为“禄爵封侯”；以一龙一凤组成的吉语叫“龙凤呈祥”；以二鱼组成的吉语叫“年年有余”。

吉语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未来前途的追求。孩子出世后，有“岁岁平安”、“长命百岁”等吉语。孩子长大后，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有“望子成龙”、“富贵长春”等吉语。吉语在民间婚俗中也很普遍。过去姑娘订婚时，赠给情人的荷包汗巾上，绣有“凤串牡丹”的吉祥图案，以表示爱情的专注。结婚时，姑娘怀抱瓶子上花轿，寓意“怀抱平安”；瓶中盛着美酒，与丈夫同饮交心酒，寓意“夫妻长（尝）久（酒）”。在结婚典礼上，新娘要换上由玉兰、海棠、芙蓉、桂花组成的绣花鞋，寓意家中“玉堂富贵”。新婚在蜜月中，新娘要换上由梅花、玉兰、青竹、菊花组成的绣花鞋，以此祝愿夫妻“百年和合”。新房是吉语最集中的地方，门上贴的，墙上挂的，都有着与婚姻美满有关的、憧憬未来的、各式吉语寓意图，甚至在新娘的被窝里也放有红枣、花生、粮果、莲心，寓意“生活甜蜜”、“早生贵子”。

吉语不仅服务于生者，还服务于死者。出土文物的金箔钱上，就刻有“往升仙界”、“花开见佛”等古语。

吉语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应用，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流传下来，并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如“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步步高升”、“旗开得胜”等。有些吉语本来已消失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现了，如“生财致富”、“恭喜发财”、“金玉满堂”等。

比比谚语和成语

谚语和成语关系很密切。有的成语是从谚语里截取的，如“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擒贼擒王——射人先射马、擒贼擒王”；有的成语是把谚语加以压缩而成的，如“不郎不秀——郎不郎秀不秀”，“吠形吠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有的谚语是把成语加以扩展而成的，如“鲁班门前掉大斧——班门弄斧”，“一心不能二用——心无二用”。意义相同

相近的谚语和成语，连接起来简直是歇后语，如“现钟不打打铸钟——舍近求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作自受”。

谚语和成语的意义很特殊，都是社会共同约定的，不能望文生义，自作主张。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多比喻仅一个人打闹不起来，而“孤掌难鸣”只比喻仅一个人办不成事情；“排忧解难”、“排忧解难”里的“难”是危急的意思（读 nán），“解”是消除的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里的“长”是增加的意思（读 zhǎng），“志气”是胆量的意思。

有趣的成语之最

最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	最长的寿命：万寿无疆。
最荒凉的地方：不毛之地。	最昂贵的稿费：一字千金。
最有学问的人：博古通今。	最吝啬的人：一毛不拔。
最悬殊的区别：天渊之别。	最绝望的前途：山穷水尽。
最长的脚：一步登天。	最艰难的争辩：理屈词穷。
最反常的气候：晴天霹雳。	最高的巨人：顶天立地。
最快的速度：风驰电掣。	最快的流水：一泻千里。
最宽阔的胸怀：虚怀若谷。	最难做的饭：无米之炊。
冲得最高的气：气冲霄汉。	

熟语·格言·警句

熟语，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

格言，亦称箴言，即含有教育、劝诫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内容积极健康，观点正确鲜明的格言，往往能使人警省、令人感奋，催人向上。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时间就是生命”，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等等，无不如此。

警句，常指诗文中句言简炼，语意新颖，涵义深刻警策动人的句子，有时也称格言。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歌德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等流传千古的警句，同样给人以启迪和激励。

谦语雅语种种

请人原谅说“包涵”求人帮忙说“劳驾”向人提问说“请教”得人惠助说“借光”无暇陪同说“失陪”归还物品说“奉还”需要考虑说“斟酌”请人勿送说“留步”对方到场说“光临”未及迎接说“失迎”请人接受说“笑纳”祝人健康说“保重”接受好意说“领情”

“笔”之种种补记

开始写作叫“动笔”，提笔撰文和作画叫“命笔”，轻松自如的文字叫“逸笔”，写作过程的中断叫“辍笔”，文章臃肿的文字叫“赘笔”，个人

亲自动手写叫“亲笔”，对上写信的谦称叫“谨笔”，本人口授他人写叫“代笔”，对下写信的谦称叫“草笔”，文章的韵味风格叫“文笔”，皇帝书写的文字叫“御笔”，在前段文章中为后段文章埋伏的线索叫“伏笔”，读后感写的文字叫“随笔”，与题旨无关的话叫“闲笔”，结束后补充文字的叫“余笔”，细致的文字绘画叫“工笔”，请人书画的稿酬叫“润笔”，无聊庸俗的文字叫“歪笔”，动手拟订集体名义的文稿叫“执笔”，文章写得好的地方叫“妙笔”，练习性的写作叫“练笔”，愉快地作文或作画叫“欣然命笔”，好的文章或语句叫“成功之笔”。

中国文字的两个源头

中国文字的第一个源头是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的距今 7350 至 7800 年前的彩绘符号。它们后来发展成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乐都柳湾、清江吴城、宜昌杨家湾等地出土的大批刻画符号。尽管许多学者不承认它们的文字性质，说成是“随意刻画的记事符号”、或“八卦数符”，但不少彝族学者反复指出它们与现存古彝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许多刻画符号均能用古彝文释读。

中国文字的第二个源头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地出土的距今 5500 至 6300 年前的彩绘与刻画的象形符号。它们虽比大地湾刻画符号晚了约 2000 年左右，但从字形结构来看，已具有偏旁部首之类组合形式，而在使用方法、使用场合、刻画部位、刻画对象等方面，表明它们也是一种记录丧葬祭祀巫术法器咒语的成熟文字，只是以象形为特征而已。它们之前似乎还有一个漫长的草创阶段，估计也需 2000 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它们的萌芽可能在距今 8000 年前左右。这种以象形为特征的音节文字，后来可能随原始居民的迁徙，一部分去美洲演变成玛雅象形文字，一部分溯长江而上入四川演变成巴蜀图符。而留在大汶口地区的原始居民可能融合到中原地区，其文字被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先民所吸收，演变成后来的殷墟汉甲骨文，时间当在距今 7500 年前左右。因为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 7500 至 8500 年前的三块刻符龟甲和一件有镌刻符号的柄形饰，上面的“日”、“目”二字，和殷墟汉甲骨文完全一样。

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不仅开了中国文字史上的龟灵崇拜卜甲刻辞之先河，而且也是汉甲骨文之原胚。它简化了大汶口遗址刻画象形文字，采用了大地湾遗址刻画文字草线刻画书写方法，又保留了象形基本形式，并吸收了大地湾遗址刻画文字的表音技巧。自贾湖遗址至殷墟汉甲骨文经历了漫长岁月，反复吸收西边的刻画文字，并交叉组合成十几万个汉字。

筵席上谈文字学

苏州人李璋，性聪明而好嬉谑，一日，应某富翁之约赴宴。此翁虽富而吝啬。席上，李璋恰巧坐在主人身旁。菜肴摆上筵席时，李璋发现主人面前的煎鲑鱼特别肥大，他向主人说：“我与主人都是苏州人，常见人写‘苏’字不大一样，不晓得‘蘇’字的‘鱼’究竟应在右边，还是应在左边？”主人答道：“古人作字，不拘一格，‘鱼’左左右右，移动一下，都可以的。”

李璋马上把主人面前的那盆煎鲑鱼拿在手里，向众客道：“谨领主人教。”

今日左边的鱼，就移动一个，放在右边如何？”说罢，他把鲑鱼推向众人，说：“请！”（按繁体字“蘇”，也可作稣。）

令人啼笑皆非的日本汉字

日本的汉字虽然来自中国，但日本人使用汉字却是十分有趣的，许多字词往往不能按中国汉字的意义去理解，有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意思。

进屋要先脱“裤子” 有人要去日本时，朋友劝他小心：“日本人在进屋子时都要人脱‘裤子’的。”后来才知道，“裤子”其实是“靴”的发音，意即进门要先脱鞋。

“丈夫”是指健康、强壮 日本女人称自己的丈夫叫“主人”，太太则叫做“女房”。某君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偕同妻子立刻去拜访保证人田中先生。接了门铃，前来应门的是田中太太，她引导客人进入客房。“这是我的‘主人’”，临别时，田中太太写了个“丈夫的身体”等字，客人揣摩了好半天，以为是她要交代什么“秘术”，后来才知道又会错了意，原来日本人称丈夫为“主人”，而真正的“丈夫”则是指“健康、强壮”的意思。

“娘”的意思是女儿 某人写信给一个日本朋友，在封笔时特请他代为问候他“娘”好。没想到，这个朋友回信说，他的“娘”目前正在大学专攻西班牙语，将来打算出国深造云云。令人不解，赶紧拿日语字典一查，原来“娘”是女儿的意思，要问候他的母亲，却问候到了他的女儿去了。

这儿不是“公厕” 旅行中急着到处找厕所，远远看到一幢民宅门上挂着“御手洗”的牌子，一群留学生要解手，就急急忙忙地要闯将进去，没想到被里面的人骂了出来：“这儿不是公共厕所！”这时，日本导游跑了过来说，这家人姓“御手洗”，这是他们的家不是公厕，把这群“老外”学生笑得一个个仰不起头。日本人的名字千奇百怪，像“御手洗”也只是其中之一小怪。

人名闹出的笑话 有些稍有中国文学修养的日本人，特别喜欢用中国式的名字来表示他们的学识根基。例如日本现在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对中国《史记》入谜，就取名为“司马迁太郎。”

但是也有些日本人在附庸风雅时，闹出了笑话。有一个专门教人跳日本传统歌舞的道场，主持人取了个自认为风流倜傥的艺名“花柳三郎”挂在大门口，让人每一次经过这儿时，都要为这位花柳先生大笑三声。

让人搞不清的字眼 日本的汉字里还有无数让人搞不清楚的字眼，例如“邪魔（打扰的意思）”、“迷惑（添麻烦）”、“水臭（见外）”、“立腹（生气）”、“钱汤（澡堂）”、“辛抱（忍耐）”、“素乱（潇洒）”，能说来自汉字文化的国家，你就看得懂日本的汉字吗？不信，我再出个交通标语考考你：“油断一时，怪我一生。”“油断”指不留意，“怪我”是受伤之意，整个意思是“一时的不注意，会带来终生的遗憾”。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

利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只需记住“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四句口诀，便可简捷地翻到所查的字。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福建长乐县人高梦旦，

早就觉得《康熙字典》检查不便，思创新法。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他只按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 214 部，就相近者并为 80 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他自认此法不不完善，故未公之于世，继续研究。“五四”运动后，一个叫王云五的人进入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见其思维缜密，便把自己的研究草稿交给他整理，支持和赞助他深入研究下去。王云五在高梦旦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再探索，终于在 1926 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因此。可以这么说，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奠基人是高梦旦，集其成者是王云五。

说来有趣，高梦旦当年的创造得力于林语堂创造的一种首笔检字法的启发，而王云五的发明，又受到了林则徐的人名簿索检法的启发。据记载，林则徐为批阅公牒的方便，曾创订四册人名簿，题名《千古江山》，凡姓字第一画是撇的，则入“千”字簿；第一画是横的，则入“古”字簿；第一画是点的，则入“江”字簿；第一画是竖的，则入“山”字簿，查阅十分方便。林氏的这种检字法，与比他后出的“上下左右部居法”和“首笔法”很相似，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则主要是在林则徐的人名簿索检法的启示下，根据“上下左右部居法”和“首笔法”研究出来的。

第五章 文学、戏曲

“文学”初义非今义

西汉时期，学校的负责人不称校长或教官，而叫“文学”，如称张文学、李文学等等。唐代的州县设有博士，后期也改称“文学”。汉武帝时，为了选拔人才，设有“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国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者便叫作“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行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是指精通儒学经典的人。

大概在魏晋后期，“文学”才成了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史书上记载的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中的“文学”，就似今天所说的“文学”的含义了。

孔子与汉民族文学传统

从文学的起源上讲，恐怕任何民族最早出现的都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抒情诗，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形式，然则为何各民族文学史多以描述英雄业绩之史诗（叙事诗）发端，而汉民族文学史却以抒情诗发端？究其缘故，和孔夫子是大有关系的。

各民族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在见于文字之前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口头流传阶段。荷马史诗经过300年口头流传才写成文字（若从荷马之前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算起，时间更长），又过了三四百年才最后编定。我国少数民族有许多史诗，经过数百上千年口头流传，近年才开始做文字的记录和整理。而抒情诗因为没有故事情节，很难在口头长期流传，即便写成文字亦不易长期保存。古希腊在荷马之后二百年出现过一个抒情诗的繁荣时期，保留至今的作品却少得可怜。例如当时著名女诗人萨福，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位文艺女神”，据载写过九卷诗，传下来的却只有两首和一些残句。至于荷马之前的抒情诗，自然更无法见到了。

中国的《诗经》，基本上是一部抒情诗集，2500年前，经编订就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对它的高度重视。孔子对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以至寸步难行，干脆就没法做人！然而，这种重视乃是建立在对它的曲解基础之上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实则，按照孔子的正邪标准，《诗三百》决非“无邪”。但既然老祖宗已经做了鉴定，后世儒家遂推尊之为“经”，视之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教条，以至认为“关关雉鸣”一声鸟叫就关系“风化天下”云云；固然都是为适应统治阶段的政教需要。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的歪曲自不待言，但这部产生于两三千年的抒情诗集因而得以长期保存和流传，却是个积极的结果。

然则，为何汉民族文学史上基本没有史诗？此亦与孔夫子有关。史诗主要反映古代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这种认识要不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亦必混杂神话的成分，即一方面将自然力人格化，另一方面又将人神化，人神不分；而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便重人世而忌

言神怪，这就使得与神话有关的文学作品很难以其本来面目流传。儒家学说，可用孔子一句话概括：“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有次子路问“事鬼神”，便碰了钉子，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壮起胆子再问一句：“敢问死？”回答仍旧是：“未知生，焉知死！”这种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是很令人感动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这位老先生又“信而好古”，凡古时传下来的东西都不好断然否认，于是便加以“合理”解释。例如，将“黄帝四面”释为“取舍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是说黄帝有四张脸；“黄帝三百年”释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不是说黄帝活了300年；“夔一足”释为“夔一而足”，不是说他只长了一只脚。后世儒家仿此，于是长着人首蛇身的伏羲、鱼或是熊变的鲸和禹等等，都是成了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写完《五帝本纪》之后感慨地说：“百家言黄帝，共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为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本纪书首。”这就透露出神话被历史化的消息。这样做不是毫无道理，因为神话产生原有一定史实作依据、但反过来又把神话历史化，其结果必然是对神话传说本身的肢解和破坏。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神话记载，范围广泛，均语焉不详，有的几乎只留下个名字，事迹殊少，当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学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学作品，而我们除了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外，剩下的就只有散见于各书的神话残骸了。这和儒家“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是有直接关系的。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问题，可以说孔夫子出于坏的动机却办了件好事，出于好的动机又办了件坏事。好事坏事加在一起，便决定了汉民族文学史由抒情诗发端的独特传统。这个发端十分重要，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汉民族文学的面貌。《诗经》的传统也就是抒情诗的传统，它不但贯穿整个文学史，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着其他体裁的产生和发展；再者，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别于西方的民族特征，也正是由抒情诗传统所决定的。

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世界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是著名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 - 1900）。他著的《中国文学史》于1880年在彼得堡出版。此书虽已绝版，但前苏联的一些大型图书馆都有珍藏。今天前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在参考它。前苏联出版的《世界通史》（有中译本）所列的参考书目上就有这本书，并已载入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科学院院士，对促进19世纪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过出色的贡献。他除了写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之外，还编撰了一部《汉语词典》。瓦西里耶夫对我国佛教和孔子的研究成效卓著，曾评注《论语》。在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就用了较多的篇幅，阐述孔子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另外，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著有《中国文学史》，1895年出版，古成贞吉著有《中国文学史》，1897年出版；英国学者赫伯特·贾尔斯著有《中国文学史》，1901年出版。

至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当推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出版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比上述四部稍晚。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确立于何时

中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并非确立于古代，而是确立于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从未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由此决定：对于全部古代文学来说，爱国主义文学只不过是整个文学乐章中的几个零星音符。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才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交响曲的主旋律，中国文学也才牢固树立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与坚船利炮一起到来的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中华民族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文化觉醒与历史抉择。这一切，有力而深远地规定和制约着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方向。当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张维屏、朱琦、何绍基、林昌彝和贝青乔等极少数开明士大夫，以他们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诗文，掀起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浪潮。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日益急迫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形势下，发生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文学改良运动，近代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终于在20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诗文、小说和戏曲中，普遍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言词，小说一跃而为文学家族的骄子。一代宗师梁启超成了“小说界革命”的开山祖，带着艺术批判锋芒的谴责小说达到了近代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唐代文苑风尚

中国是诗歌的国家，尤其唐代的诗歌创作更是灿烂辉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云集朝野、辈出不穷。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整个国家、民族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氛围中，因此，“好语王霸大略”，已成为唐代文人施展宏图的风尚。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说出了文人们真实的心声。在唐王朝开疆拓土的征战中，他们又激情高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表现了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

“学而优则仕”。唐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给文人面前展现出一条实现政治的光明的广阔道路。为此，多少人学史穷经，寻章摘句，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创作佳作、金榜题名而奋斗不息。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孟郊“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李贺背着锦囊觅句，贾岛骑驴推敲，历代文坛传为佳话。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人人爱诗，人人习诗，诗歌园地百花争妍，蔚为壮观。

唐代文人在或怀才不遇，或仕途失意，大都从“入世”转向了“出世”的消极情绪。有的感叹壮志难酬：“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有的厌倦官场生活而向往萧散优游。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就是这种优闲生活的生动写照。于是，隐居、郊游、赏花、歌舞、书法、绘画、交友，交织成了文人丰富的生活情趣。从而孕育出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和为人称道的书法、绘画，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唐代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也给文人们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纵情酒色，放浪不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白居易蓄婢：“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李白“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杜牧扬州押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就连道貌岸然的韩愈，也好资财，耽声色。这样，“时代精神已不在大漠风尘，而在花前月下；已不在马上拼杀，而在闺房画眉；已不在世间进取，而在心境解脱”，形成这种景况，是令人深思的，“都云文士狂，谁解其中味？”

元散曲家为何嘲笑屈原

读元散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几如楷模屈原，在这里却成了揶揄、嘲笑的对象。田守真就这一现象著文作解释。

在元散曲家的心目中，屈原代表着两种传统：一是文学传统；一是伦理——文化传统，后一种正是他们所嘲笑、否定的。当他们揶揄屈原的时候，屈原只不过是他们所抨击的儒家传统的一个象征和代表符号而已，而并没有歪曲原形象。他们对屈原及整个儒家传统的否定、嘲笑是由他们自身所取的虚无、冷漠、自以为超越一切现实矛盾纷争的达观态度所决定的。他们除持庄子的否定、批判态度之外，更多了一层市井习气、浪子习气，以至推到了一种极端的“玩世”态度。此外在市民阶级那种萌芽状态的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下，也使元曲家们的作品表现出重视现实人生、重视自我、重视行乐、否定服从愚忠等思想倾向。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散曲是配合流行曲调清唱的歌词这种形式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使它从产生起便成为离国家大事，离儒家道统最远的一种形式，也成为上下文人泄怨叹世的专利品。

民间故事的文化精神

学术上民间故事的概念，与神话、传说有区别。通常民间故事泛指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

学术上民间故事的概念，与神话、传说有区别。通常民间故事泛指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

人民永远需要表现高尚情操，反映人民风趣和机智的作品；民间故事为文学的民族化提供了借鉴，说明民族性是我国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除此之外，民间故事本身内在的文化精神，使一般读者和学者对它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和评价。它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丰富，是任何作家文学所不能取代的。

大量幻想性故事中，充分表现了人类初级形态的思维的整一性。神话、童话中的人兽共体、人兽变形等表现了那种超时间、超空间的宇宙观。在原始思维中，把世界的空间，人类的历史，都视为无界限的存在，人们相信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将人、动物、植物以及广阔无垠的自然界，连续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人、动物、植物、无机物都放置在同一层次上。于是，过去的事物和眼前的事物可以发生关系，进间的顺序可以颠倒。由于人的自我意识不强，万物和人本身可以互交。于是，人与万物的活动，既可以扩展到空间的全部领域，时间上也可以上伸至荒古之际，下延至文明时期。所有的空间，全部的历史流程，都可以成为幻想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空间舞台。

因此，一些有因果联系的和没有因果联系的事物，常常混同起来。在神话和童话世界里，从天上到地下，从神界、人间到动植物界，便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或各种半动物半人的形象，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或人兽交配，或兽形人语；忽而天上神界，忽而人间。这几乎都可以追溯至原始思维的超时空观念。尽管这种超时空观在我们看来荒诞离奇，但却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料。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各种文化形成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性故事中所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因素，证明人类文化确曾经历过一个混沌一体的阶段，后来将其区分为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等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乃是人们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果。由此可知，人类从无知通向科学，其间有着多么迂回曲折的历程。幻想性故事中的原始的超时空观所体现的整一性和思维方式，显然是属于最低层次的统一性。它们在本质上是未经科学分析的综合，所以才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等同的、有联系的整体。

不管原始的整一性思想披着一件多么荒诞神秘的外衣，也不能忽视幻想故事想象的创造力，不能忽视其中合理的，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宇宙观，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人类一旦进入理性思维阶段，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哲学信念，无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科学的形成，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神话和童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整一性，却长期被冷落。民间故事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成果，在科学史上，如果加以有意识的、自觉地运用，便能化为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

尽管如此，民间故事的世俗文化仍是主要的。有的故事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改造自然的结果与文化形成的关系。不过，大量的故事表现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民间故事有着鲜明的伦理道德观。任何时候，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永远处于矛盾之中。因而人和现实世界必将不断地发生冲突。人们在矛盾中所产生的喜怒哀乐都在民间故事里有充分的表现。人们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态度鲜明，爱憎强烈。民间故事的形象很少有多种矛盾或多重性的性格，通常对正面形象总是加以理想化，对反面形象极力夸张，使其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对比鲜明。人民的感情是纯朴的，他们往往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反映、评价生活，也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美化生活。

故事里的正、反两种势力的斗争，有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的象征新旧观念，有的表现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的矛盾。不管题材、情节怎样，人物的类型都很明确，不正即反。甚至有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同一个人物，在这个故事中是正面的，在另一些故事中又是反面的。如秦始皇，他在孟姜女故事里是个暴君，而另有一些传说又歌颂他是一位修长城抗番，同情人民苦难的明君。这都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可能是产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地区的作用，表明了人民不同的心态。如果把所有秦始皇的故事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解人民在每一则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伦理道德观，人民对秦始皇的总评价及所进行的褒贬无比公正。即使是精灵的变形，基本上也属于神物或妖魔正、反两种类型。

可见，在民间故事中，主要因素和客观因素始终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再现生活，但基本上不违背现实生活的因果律，因此这种主观倾向包含着明显的道德教诲。这些，都不能用当代的审美观去评判，因为传统民间故事反映

的是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审美观，对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曾有过巨大的功绩。不理解这些，就不可能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

尽管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基本属性仍然应该是民间传承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它不同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更不能等同于民情风俗、宗教、语言、历史，它只是和它们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多功能性，指的是它同时具有多种科学价值。

各种人文科学经常运用民间故事资料，形成对民间故事的多角度研究，英国学者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处引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来解释某些天文现象。如日中有鸟的神话，他认为这便是中国古代对太阳黑子的记载。

民间故事流传的时间久远，必然积淀了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文化心理形成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样漫长过程的文化沉积层，在作家文学里是找不到的，而在民间故事里，既有原始的多神崇拜，又有发展了的一神崇拜；既有血缘婚，又有低级类型的一夫一妻制。有时，透过同一篇故事的流传演变，还能剖析出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沉积层。如《白蛇传》的白娘子的原型，便可追溯到原始的动物崇拜。

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衡量，我国民间故事无疑是各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文艺家的创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真实可信的资料。

古代笑话文学

谈到中国的笑话文学，算起来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远在周秦时代，庄子和韩非子便利用笑话作为说服对方的工具。到了后汉邯郸淳著有“笑林”一书，算是笑话专书之祖。至隋代，侯白撰了《启颜录》，那是一本记隋朝人物的笑话，有一则如下：

“隋朝有一个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必召与谈。尝岁暮，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其人低头良久，问云：‘白白白白日，抑夜夜夜夜晚？’素云：‘何须云白日夜晚，若为得出？’乃答云：‘若不是夜夜晚，眼睛不瞎，为何入入入到那里？’素大笑。”

宋代诗文大家苏东坡，笔调谐趣，一时无两，他写了一册《艾子杂说》，有一段说：

“艾子好饮，很少醒目，学生大家计议道，此不可以谏止，唯有以险事吓他才可戒。一日，大饮而吐，学生密取猪脾置吐物中，持以告他道：‘凡人要具五脏方能活，今老师因饮而吐出一脏，只剩四脏了，怎能生呢？’艾子熟视而笑道：‘唐三藏（脏）犹可活，况有四脏？’”

后来他又写了一册《艾子后说》，也是很富幽默意味的。

在笑话方面，元代又出现了两部名著：一是《笑海艺林》；一是《笑苑千金》，都是很浅白的笑话著作。后者载有一则说：

“一信民往万灵庙求神，若保佑明日天晴，必以羊肉供奉。另一信民亦来祈祷，若保佑明日天雨，必以猪肉供奉。神公公自喜曰：“唔，若是天晴，我便食羊；若是天雨，我便食猪。反正都有得食，何忧之有！””

这则讽刺木偶的笑话，可说入木三分。

以“三言”闻名的明末大文学家冯梦龙有《古今笑》一书（又名《古今谈概》、《古今笑史》），这是一部笔记文学，取材史籍，故而开创了笑话文学的另一途径。此前还撰有《笑府》、《广笑府》。

文学史上的佚名作品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传世佳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独揭妙谛的名篇，未见著作家姓名根植，无从说及时代、籍贯和大背景了。虽经考证，仍难究明细，察其源由，当有诸因：

1. 年代久远，不知所本，如《山海经》（传为夏禹、伯益所作）、《卜居》、《渔父》和《神女》、《登徒》（分别传为屈原和宋玉所作），实误，“其世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崔述：《考古续说》）。

2. 由民歌演变的几代人集体创作，时有修改，则很难用一两姓名表示，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

3. 作者从实不从名，为使己作留影后世，借托名家手笔，如李陵、苏武的五言诗，“携手上河梁，问子何所之”，因为世人传诵，搜入《文选》。

4. 因为政治需要，文为时而作，而攀援古人，以激励世人，如所谓岳飞“手书摹刻汤阴庙中”的《赠吴将军南行》、《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多系明人伪托，而隐去真名；李秀成《壮志》两首，亦系辛亥时革命党人贗品。

5. 文人好古，惯于借古人姓名，发现己作以抒情怀。如《古诗十九首》几首借枚乘之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崔述：《考古续说》）。

6. 敬慕古人，而憾其作品有所不足，遂借其姓氏而作，故作品不见于同时代，或相关文集里；却见于隔代的著作，如见于晋张俨《默记》的所谓诸葛亮《后出师表》。

7. 含有隐晦深意，且也忌讳时尚，为免众矢之的，故埋去本名者，如《金瓶梅》。

8. 署名主官，实出自幕僚代笔，由此作者之真姓名被隐去，以致后人追溯，难寻本源，如《史可法报多尔衮书》，作者分别见有侯方域、王纲等 8 人，众说不一。莫衷一是。

文学家的青春火花

许多文学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成名之作，那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使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诗人屈原，21 岁时，就写出了表现自己坚贞而高尚的情操的《橘颂》，写成不朽诗篇《离骚》时，只有 23 岁。

文学家陆机，20 岁写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文赋》。

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30 岁写出了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时，只有 16 岁，35 岁时，写成名篇《长恨歌》。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相传 7 岁就写了《咏鹅》这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形象鲜明，诗意清新。

唐代诗人王维，9 岁即能写诗作画，16 岁时写了《洛阳女儿行》，17 岁

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有名诗句。

晚唐诗人李贺，一生只活了27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的诗人。据《新唐书》云：“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哥名动京师。”有《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8岁即能写诗，10岁已享有盛名。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歌，有《剑南诗稿》共收集诗90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一位诗人。

南宋词人辛弃疾，少时即文思敏捷，才气过人，15岁就作诗填词。26岁写成力主抗金、光复河山的论文10篇，名为《美芹十论》，文章议论精辟，激昂慷慨，极有见地。

明代诗人夏完淳，5岁知《五经》，9岁善词赋古文。13岁作评论时政的《大哀赋》。14岁从军，后受牵连被捕下狱。作乐府诗数十首。17岁殉国。临死前写《狱中上母书》。现存《夏节愍公全集》10卷，补遗2卷。

新文化革命的行驱者鲁迅，23岁写出《自题小像》等著名诗篇，27岁发表著名论文《摩罗力诗说》，发表《狂人日记》时，只有38岁，接着连接出版了《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

诗人郭沫若，30岁出版了震动当时的文艺界的诗集《女神》，32岁，又写出了收入《星空》、《瓶》、《前茅》等诗集中的大部分诗。

作家茅盾，32岁写出第一部小说《蚀》，不久，又写了《虹》，38岁出版了名著《子夜》。

剧作家曹禺，24岁完成了处女作多幕剧《雷雨》，26岁，写成《日出》，这是在中国话剧史上大放异彩的作品。

作家老舍，23岁发表短篇小说《小玲儿》，25岁在英国任教。在英教书5年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

作家丁玲，23岁开始写作，26岁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

作家冯至，18岁开始发表诗和散文，22岁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

艾青，22岁开始发表诗歌，33岁正式用“艾青”的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36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以佳句得名的文学家

1. 唐代韦庄继我国第一首古典长诗《孔雀东南飞》后，以黄巢起义为题材，写下又一首长诗《秦妇吟》。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名句，传颂千古。人们因而称他为“秦妇吟秀才”。

2. 唐代赵嘏描述边塞凌晨景色时，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的妙句。博得大诗人杜牧吟叹，因而称之为“赵倚楼”。

3. 宋代饶节有“间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之句，人们称他做“倚松老人”。

4. 宋代贺铸《青玉案》中句云：“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用江岸如烟的青草，随风飘荡的柳花，江南梅熟时的连绵阴雨来比喻闲愁纷繁，成为绝唱。被称为“贺梅子”。

5. 明代崔华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清代王莘有“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和“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有人行”之句。他们分别被称为“崔黄叶”和“王黄叶”。

6.清代张锦麟以“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出名，时人称他为“张碧天”。

文人“梦笔”

人类如果没有梦这种生理现象，单就文学宝库而言，所受影响将会是怎样的呢？起码，作品的数量既不会像现有的这么丰富，文学的色彩也不会如现有的这么绚丽多姿。因为没有了梦，以梦为素材的作品便不会出现，梦中赋诗填词之类的事，如《东坡志林》的“梦寐”部分，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也都将化为乌有，至于借“梦”反映现实生活，诸如关汉卿的《蝴蝶梦》、《绯衣梦》，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学巨著，咱们恐怕也就无福拜读了。

在中国，流传的一些文学大家“梦”中增长才干的故事，似乎更能显示出“梦”与文学之间的不解之缘，“梦笔”，便是这类故事中的“一束”。

梦笔如椽：东晋王珣，文章本已写得不错，跟殷仲堪、徐邈等人齐名，并且“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很得孝武帝的赏识。一次，梦见有人把如屋椽似的巨笔送给他，醒后，他顿感文才倍增。跟别人说：“此当有大手笔事（意即：最近将有重要文章要我去写。——笔者）。”不久，孝武帝死，一切哀册谥议，都是他所起草。由于这则故事的流传，故尔至今人们还用“如椽之笔”、“大手笔”来赞扬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笔力的雄健。

梦五色笔：这是南朝江淹的故事。江淹曾在宋、齐、梁三朝当过官，是南朝的重要文学家。他所写的抒情小赋如《恨赋》、《别赋》等，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南史》曾载这位文学家的颇为神奇而曲折的遭遇：他小的时候，颇好文学。一次作梦，梦一神人授给他五色笔。从此，他“文藻日新”，每写一篇，便广为传播。晚年，一次在冶亭住宿，又做一梦，梦见一人，自称郭璞（东晋道家人物，文学家、训诂学家），向他讨还五色笔。江淹从怀中掏出，还给了他（另一说是：在梦中，江淹怀中的一匹锦，被自称张景阳的讨还回去）。自此之后，江淹再作诗文，就“绝无美句。”当时的人们都说他“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至今还流传在人们的口语或书面语中。

梦青镂管笔：纪少瑜曾在南朝梁朝做官。小时候，他文章写得很好。一次，梦见陆倕（较早于他的文学家）把一束青镂管笔（笔管有青色雕饰之笔）给了他，并告诉他说：“这些笔还可以用，你选择其中好点的用吧。”从此，他的文章“因此道进”，他本人也颇得简文帝的重用。

梦双笔：唐代文学家李峤，小时候曾梦见人家给他一双笔。之后，再写文章就变得“有文辞”起来。文学造诣，与当时的骆宾王、刘光业等齐名，并且后来还当上了宰相。

梦笔生花：李白，是唐代文学家，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新唐书》载，他的出生就很神奇：生他之前，母亲曾梦见长庚星（又名“太白星”）入怀；生下之后，故给他起了“太白”的名字，《开元天宝遗事》，还载有他“梦笔头生花”的故事，李白小时，梦见自己所使的笔，笔头生花，于是乎后来便“天才瞻远，名闻天下”，成为出类拔萃的大作家。

以上种种“梦笔”故事，初看似似无稽之谈，但若联系故事主人公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作番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原是一些美妙而瑰丽的传说，是与迷信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的。慢慢寻绎，还可从中

找出些发人深思的道理来。如，故事主人公之所以会作“梦笔”之梦，这是由于他们对文学和写作的特别爱好而引起的。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饥者梦食，寒者梦衣，自然之理。现实中没有或根本没有思念过的事情，几乎不会出现于梦境。人们中有谁“梦乘车入鼠穴，捣捣铁杵”（《世说新语》）呢？以上5人的“正史”本传中，即可见到关于他们原先就“留情于文章”、“能属文”的记载。热爱文学，喜欢写作，梦中梦见所熟悉的写作工具——笔，是属当然之理，有何可怪之处？

再者，以上5人，多数家境贫寒、困窘。江淹“少孤贫”，李峤“早孤”、纪少瑜的遭遇更为坎：他本姓吴，因“少孤”而被纪氏收养，故改姓纪。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有：“少勤学”。李白虽出身富商，并曾逃学。但后来在一位用“铁杵”磨针的老婆婆的启发教育下（尽管是传说），也发愤读起书来。由此可见，超凡的才能，并非得之于“神授”之笔，而实由苦学而成。

再次，我们也似可从“梦笔”故事中的“传承”关系（如郭璞之于江淹，陆倕之于纪少瑜），去考察一下诸如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二者文章风格的异同，成就的高下，等等。

由上可见，“梦笔”之类的故事，不过是人们出于对李白等文学家的非凡才能的景仰和赞赏，而作出的带有传奇性的解释而已。

历代文人的怪癖

癖，即嗜好也。不少文人都有独特的癖好。

近代著名者闻一多先生有“书癖”的雅号。他读书时专心得连蜈蚣爬进了鞋子都不知晓。癖书如疾，正是闻无生成为著名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著名书画家张善孖（张大千之兄），以绘虎蜚声艺坛。他癖虎养虎，人誉之为“虎痴”。解放前，有人走访他于苏州网师园住处，见他所饲之虎，令之坐则坐，令之卧则卧，简直像个驯虎大师。

宋代司马光是个“墨癖”。他爱收藏墨锭，一生蓄墨几百两，他蓄墨是为了教育后代，“欲子孙知吾所用此物何为也？”这种癖好，自有其良苦的用心。

清代文学巨子袁枚是个“食癖”。他的名作《随园诗知》，几乎无人不知，而他另一本洋洋万言的烹饪专著《随园食单》却很少为人注意。其中收录的“食谱”几百种，大都亲自尝过做过，并从营养学、食品卫生、美学、心理学等角度上去研讨总结，颇多发明。一次，袁枚在友人家吃到一盘可口的豆腐，他即席讨教豆腐的烧法，主人和他打趣，要他三折腰方肯传授，袁枚真的下席三次鞠躬。当时有人见他为了一盘豆腐而打躬作揖，就写了一首诗取笑他。诗云：“珍味群推郇令庖，黎析尤似易牙调，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郇令，指唐代韦陟，此人十分讲究饮食，陶元亮陶渊明；黎析，是豆腐的别称。）

在古人的心目中，常把梅、兰、竹、菊视为清高、廉洁的象征，为之倾倒成癖的就更多了。陶渊明癖菊，周敦颐喜莲，林和靖爱梅，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嗜竹者也不乏其人，苏东坡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有句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是另一个“梅癖”。他在安徽为滁县令时，见到醉翁亭旁的古梅，伏池便拜，还口呼“梅兄”不止。这些癖好的形成，通常是由于骚人墨客郁郁不得志，

借以寓情托志。

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更是一身兼数癖。既是“石癖”，又是“书画癖”。他看到奇峰异石要口呼“石兄”，袍笏以拜。见到书画珍品更是以命相搏。一次，蔡攸在船上邀米芾相见，将自己收藏的《王略帖》给米芾观赏。米芾一见，爱不释手，提出要用书画与蔡攸换这帖。蔡攸不肯，米芾即口称：“如不见允，唯有一死。”说毕，马上据舷欲坠，蔡攸见一大惊，见他如此癖书画，只得应允。

《三国演义》的主题

有文章介绍，40年来，在《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上，除了认为该书“无主题”、“主题模糊”之外，又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 “拥刘反曹”说，又称“正统”说。认为《三国》以蜀汉为正统。
2. “忠义说”。认为《三国》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水准，并由此评判其它。近年又出现了“忠义变异”说，认为《三国》反复强调“贤臣择主而事”，宣扬“忠”的相对性和可移性，不同于“愚忠”；“义”的地位在“忠”之上，是贯穿全书的灵魂。
3. “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认为作者探索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什么样的人才能图霸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取得胜利。
4. “总体说”。认为通过对三国时期斗争的描写，鞭挞了昏君奸臣，歌颂了明主贤臣，从而揭示出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
5. “人才说”。认为功业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得天下英俊之才，用济世安邦之士。
6. “分合说”。认为《三国》表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辩证法及“天下归一”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7. “悲剧”说，认为对封建政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邪恶、权诈。蜀汉集团的悲剧，是悲剧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

林黛玉真有其人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历史上真有其人。据有关资料记载，林黛玉的真名叫李香玉，是康熙年间办州织造李煦的孙女、两淮盐课李鼎的掌上明珠。李煦即曹雪芹嫡亲祖母的胞弟。曹雪芹祖父曹寅过世后，由其子继任父职，不满3年，死于京师，曹雪芹就是他的遗腹子。曹雪芹祖母李氏视雪芹为宝贝，每年到苏州探望年近90的文氏太夫人时，必携同前往，常奇居于李鼎家拙政园。李鼎之女香玉与曹雪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自在意中。

康熙末年，李鼎夫妇不幸双亡，膝下仅遗香玉。此女聪颖过人，深得雪芹祖母钟爱，便接她去江宁织造署，由其祖母加意抚养。但好景不长，自雍正登极，宫廷党争，报复异己。李煦首当其冲，革职查抄，家业荡然。至此香玉已孑然一身，无家可归，长期靠曹氏庇荫。更不料雪芹家六亲同命，不到5年，即遭抄籍厄运，在江南70多年的家业被连根铲除。

1728年春，曹氏全家迁京，香玉随之。曹氏尚得亲故照料，但香玉寄人篱下，不免郁郁寡欢，加之其生来多愁善感，虽有雪芹温存宽慰，然年岁增长，终身未遂，忧思难平，不到几年，竟香消玉陨。雪芹为之悲痛大哭，故

著《红楼梦》一书以资纪念。

抒情与言志辨

古代诗歌理论中，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主张。“言志说”出于《尚书》，“抒情说”产生于魏晋时期。

“情”是一种生下来就具有的人的本能，是人性所固有的一种未经理性修饰的存在。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吕氏春秋·贵生》：“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

“志”则不同。“志”含有“识”的意思，本来意义指知性认识的心理机能，是心理有意识地向某一对象运动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荀子·乐论》说：“易谓一？曰：执神如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曷谓固？曰：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谓之圣人。圣人也者，道人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显然，荀子所说的“志”具有“尽善”和不可迁移的特点，因而，“志”已经不是一种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它经过了理性的可铸造，去掉了感性色彩和欲望的因素，是“情”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向某一对象运动的结果，其核心内容包含着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正是因为“情”与“志”有着这种区别，所以“抒情说”和“言志说”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抒情说”肯定着文学对人们的喜、怒、哀、乐等正常情感的抒发，肯定着人们的正常情欲；而“言志说”所强调的是文学对于理智的表现，肯定着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对于人性的雕琢。

中国诗歌之最

我国最早的诗歌是上古时代的《弹歌》。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春秋时的《诗经》。

我国最早的长抒情诗是战国时屈原的《离骚》。

我国最早的叙事诗的东汉时的《孔雀东南飞》。

我国第一部以作家个人选编成书的诗集是西汉刘向辑的《楚辞》，收有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 16 篇。

我国文学史上诗作留存最多的大诗人是南来的陆游，他的《剑南诗稿》存诗 9300 余首。

我国最大的诗歌集是清康熙时编纂的《全唐诗》，共 900 卷，收诗 48900 余首，作者达 2200 余人。

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诗文总集是南朝萧统（照明太子）编选的《文选》，分为 38 类，共 60 卷，700 余篇（首）。

我国最早的诗歌评论是南朝梁钟嵘撰的《诗品》。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是北宋欧阳修撰的《六一诗话》。

我国的第一部新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

我国的第一篇文艺批评文章是汉魏时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第一部文艺批评著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第一首散文是刊登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出版）上的沈尹默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立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游仙诗小话

在我国古代诗歌作品中，有一类专门写企慕神仙生活或游历仙境的诗，称作“游仙诗”。从现存材料看，最早以“游仙”作为诗的篇题的，是建安诗人曹植。其后嵇康、张华、何劭、郭璞等均有游仙之作，后世遂把“游仙诗”视为一种专体。

一般说来，游仙诗名为游仙，实在咏怀。如曹西的《游仙》云：“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指赤松子、王子乔，均古仙人名），翻迹登鼎湖（相传黄帝成仙的地方）；翻翔龙天上，骋轡远行游。”

这种假托神仙以抒写怀抱的方法，其来源是很久远的。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就曾借与群神遨游，来表现其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和报国无门的苦闷。“楚辞”中托名屈原的《远游》，就更为明显地说：“悲时俗之迫之兮，愿轻举而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另外，在汉乐府中有《王子乔》、《步出夏门行》和《董逃行》等作品，也是写游仙内容的。由此可见，“游仙”之名虽始于曹植，而写游仙内容的、假游仙以托怀抱的作品，却是秦汉以前就已经有的。

晋代郭璞的《游仙诗》14首，历来被视为这一题材的名作。他在诗中写道：“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指豪贵之家）何足荣？未若托蓬莱（指仙域）。”充分表现了他的蔑视朝贵和自己有才不得施展的悲愤心情。

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写过一些以游仙为题材的作品，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他在诗中把神仙世界描写得广阔自由，光明美好，为的是反衬出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黑暗和丑恶。因此在该诗的最后写出了响彻千古的名句：“且放白鹿（相传神仙喜骑白鹿）青崖间，腾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示儿诗”小话

我国古代诗词中，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示儿诗”，也包括“责子诗”。因为它诉之于情感，抓住了教育契机，能够深刻地感化子女，使他们永志勿忘。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一首《责子》诗，严厉批评自己的儿子，全诗如下：
白发被两鬓，肌肤有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唐代大诗人杜甫示儿诗颇多，如晚年56岁写的《又示宗武》：“觅句知新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带紫罗囊。假日从何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这首诗满怀喜悦地称赞儿子已能写诗、写文章，引用晋朝谢安善于用婉转的方法教育侄儿谢玄的故事，勉励儿子敦品厉行。并以孔门大弟子为榜

样期望儿子。

晚唐另一个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骄儿》诗，委胀。李商隐善写缠绵悱恻、伤时感事的诗，这时却写得轻松愉快。李商隐不但诗才高，而且书法“美”，看到儿子开始注意看写字，大加称赞：“有时看临书，挺立不动膝……”他直率地期望儿子：“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

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当时西北民族矛盾激化，李商隐迫切地希望诗人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此外，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词《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内写“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表明辛弃疾和他的儿子之间是存在着“代沟”的。辛弃疾政治上壮志难酬，落拓已久，50多岁时一度出任福建安抚使，工作仍不顺心，决心回家赋闲；但儿子却认为家庭经济不够富裕，要求他理干一阵。辛弃疾素来憎厌“求田问舍”、贪图近代的人，想不到儿子也这样，于是引起一顿牢骚暴发。

解放后出现了新思想、新内容的示儿诗。知识青年下乡时，王昆仑曾发表“示儿诗”，勉励其子女去农村锻炼，颇为生动。陈毅发表过“示儿诗”，告诫儿子勿作“客里空”，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针砭时弊、提倡“务实”的精神。

叠字诗词妙无穷

从商周铜器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开始，各种文体里都使用过叠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有305篇作品，其中使用叠字的就有200篇，如“关关雎鸠”、“习习谷风”、“杨柳依依”、“雪雪霏霏”等。叠字在诗词的运用，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叠字的位置来看，有叠在句首的，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杂诗》）；有叠在句中的，如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黄鹤楼》）；有叠在句尾的，如杜甫的“朔风鸣淅淅，寒雨下霏霏”（《雨四首》）。从叠字的字数来看，有一句叠一字的，如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思黄鹂”（《积雨辋川庄作》）；有一句叠两字的，如郑燮的“水流曲曲树重重”（《潍县竹枝词》）；有一句叠三字的，如吴融的“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秋树》）；有两句互叠的，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还有一句连三字或四字相重叠的，如欧阳修的“庭院深深几许”（《蝶恋花》），陆游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钗头凤》）等等。

在诗词中巧妙地运用叠字，有助于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李清照的《声声慢》，连用七组叠字，历来为人所称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字，极为细腻地表现了她那百无聊赖、愁苦哀伤的心情。14字叠韵一出，几乎关尽后代词人之口，元代戏曲家乔吉曾仿此词叠字法作《天净沙》：“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录人人。”被讥为“丑态百出”。直至清代方有女词人双卿写了一首《凤

凰台上忆吹箫》尚可与匹敌，词曰：“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全词用双字24叠，写尽自身凄凉，情哀词苦，怨而不怒，幽深婉曲。清代词论家陈廷焯赞其“运以变化，不见痕迹”，又称“可谓广大神通矣，易安见之，亦当避席。”意为该词不仅不在李词之下，反倒略胜一筹。

妙用叠字，有助于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相当成功地刻画出一个人容颜丰美、妆饰艳丽的妇女形象。

妙用叠字，有助于增强诗词的音律美。白居易《琵琶行》用叠字来描写音乐，绘声形象，拟音传神，十分绝妙：“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妙用叠字，有助于生动形象地描景状物，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杜甫诗：“天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另外还有一种叠字诗体，就是运用同字反复的修辞手法创作出来的一种诗体。

其中有一种形式是通篇都由重叠词组组成。前后词组按一定的规律拆开组句。其基本原则，是每个字都要两次出现，重复使用。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最长的一首叠字诗，由130个重叠词组组成。其中前后的词为：

野野、鸟鸟、蹄蹄、时时、有有、思思、春春、气气、桃桃、花花、发发、满满、枝枝、莺莺、雀雀、相相、呼呼、唤唤、岩岩、畔畔、花花、红红、似似、锦锦、屏屏、堪堪、看看、山山、秀秀、丽丽、……归归、去去、来来、休休、役役。

连句为：

野鸟蹄，野鸟啼时时有思，有思春气桃花发，春气桃花发满枝，满枝鸳鸯相呼唤，鸳鸯相呼唤岩畔……依此类推连续，连句为：归去来休休役役。

此外，还有一种如湖南桃花源诗碑所刻的叠半字体：

牛郎织女会佳期，月下弹琴又赋诗；
寺静帷闻钟鼓响，音停始觉星斗移；
多少黄冠归道观，见机而作尽忘机；
几时得到桃源洞？同彼仙人下象棋。

帝王诗词

封建时代的皇帝会写诗的很多，而成为诗人的却很少。当然，也有一些帝王诗词至今尚脍炙人口。

汉高祖刘邦过沛时所作的《大风歌》和对戚夫人唱的《鸿鹄歌》是汉代初真正保留下来的少有诗篇。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评论说：“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李白《胡无人》诗句“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显受其影响。汉武帝刘彻爱诗，所以设立乐府，广采民间诗歌，至今汉书艺文志能保留314篇诗歌，不能不说是汉武帝的功劳。他所作的《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十分哀婉隽美。

魏、晋时期著名皇帝诗人是魏文帝——曹丕。曹丕诗歌现存约 40 首，代表作是《燕歌行》。全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还有几篇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上留田行》，反映了社会上“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的贫富不均现象。另一首《艳歌何尝行》揭示了贵族子弟“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的寄生生活。

博览经史，“雅好艺文”的宋文帝刘义隆，在位 30 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元嘉之治，他一生图谋恢复中原，解民倒悬。其《北伐》诗云：“目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乱极治方形，涂泰由积否。方欲除遗氛，矧乃秽边鄙。誉言悼斯民，纳皇良在已。”情辞慷慨，浩气充沛，读来有曹公古直悲凉之风。

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全唐诗》共编他的诗 69 首。唐初诗坛盛行君臣唱和，赴宴酬咏之风甚炽。唐太宗有一次在洛阳宫饮宴群臣，即席治世积善，可以及时行乐，流露踌躇满志神态。魏征当即赋《西汉》诗，进行讽谏：“夜燕经栢谷，朝游出杜原，终籍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魏征每言，必以礼约我。”君臣赋诗能联系实际、自我教育和互相帮助，这是文以载道的典范。

唐昭宗李煜被迫出走华州，遥望长安，极盼有人相救。其《菩萨蛮》有句云：“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安得有英雄，迎归天内中”。日暮途穷，语意凄怆。

五代、十国帝王多不能诗，但南唐皇帝李璟父子，诗名显赫。史载：李璟多才艺，好读书，“时时作为诗歌，皆出入风骚”。传世的词作只有 4 首，影响较大的是《浣溪沙》词：“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莫，接天流。”这是一首表面上写男女的怅恨对景抒情之作，实际上是表达自己的愁恨和感慨的词。

李煜是南唐最后的一个皇帝，工书善画，洞晓音律，诗词文章，无不擅长，有同他父亲的词合编的《南唐二主词》传世。他创作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因他是李璟第六子，也有过曹植那样受猜忌的遭遇，所以他最早的词中表现了热爱自然的情怀。如《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

中期即位后，外则宋兵压境，内则人心离散，于是，在一面是战战兢兢，一面是纵情声色的环境里当了十几年皇帝，写了一些反映享乐生活的词。后期过着囚徒生活，引起词风的变化，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梦里不知身是客”饱含着寄人篱下的辛酸和痛苦。词作一是表现眼前的孤苦无告，二是在回忆往或繁华中表现自己的悔恨，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文学史上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作。可以说南唐后主词是历代帝王诗词里艺术成就最高的。

李煜词著名，诗也写得好，《全唐诗》收录他 18 首诗。《石林燕语》载：有一次朱太祖因曲宴，使煜咏其得意诗，煜即席赋《咏扇》诗，中有佳句：“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太祖曰：“好一个翰林学士。”除上述诗外，还有“鬓从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句，亦佳。

宋太祖赵匡胤也很喜欢读书，有时也吟诗作赋。《唐溪诗话》曾载有他的《初日》诗：“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赶退群星与残月。”又有“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句。意境开阔，气魄雄伟。

明朝皇帝也大都能诗，朱元璋从小要饭，没有读书，起义后收容了大批文人，朝夕讲经述史，不但懂得儒家经义，并且还能作诗和批评文学作品好坏了。朱称帝后有一首《菊花诗》颇有名：“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征东至潇湘》诗：“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真是诗如其人，既豪放，又略带风韵。还有一首咏《雪竹》诗：“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立意新颖，气魄宏大。据传有一次登朝，诗兴勃发，要与大臣们以雄雉为题，各赋一诗，众臣哪敢争先，齐道万岁先赋。朱元璋提笔一挥写道：“鸡叫一声撮一撮，”众臣见之，天不内心暗笑；朱元璋又写了第二句：“鸡叫二声撮二撮”，大臣个个内心叹息：“这是什么诗？”接着笔下跃出：“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满朝大臣齐声惊赞：“万岁有力挽狂澜之术！”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潮海》曰：“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平。”记载了康熙三十五年诗人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叛乱的情况，气象雄浑，极富光彩。

历代帝王中写诗最多的是清乾隆，作诗约4万首（一说10万首）。

帝王诗词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令人武原研究帝王诗词有年，先后有《帝王诗词名作漫话》、《君主的心声》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羽扇纶巾”到底指谁

关于“羽扇纶巾”是指周瑜还是指诸葛亮？宋人注苏词，曾有诸葛亮“葛巾毛扇，指挥三军”之说。后来在小说、戏剧中，“羽扇纶巾”成了诸葛亮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魏晋以来，上层人物以风度潇洒、举止雍容为美，羽扇纶巾则代表着这样一种“名士”派头。适临战阵，也往往如此。不管当时周瑜是否如此打扮，苏轼根据当时的风气，完全可以把周瑜写成这样一个手持羽扇、头戴纶巾，从容镇静、风流儒雅的统帅。再从文意看，从“遥想”以下直到“烟灭”，这是一幅完整的图画，中心形象就是当年的“周公瑾”，不容节外又生出一个诸葛亮来，何况这几句还和上文“周郎赤壁”照应。还有当时宋人也曾将周瑜写成这般形象：“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张孝祥《水调歌头》）。

被误解的“朱门酒肉臭”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冬（755年12月），居长安已达十年的诗人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这两句诗被称为“响彻千古的名句”。

相当一部分读者，对“酒肉臭”三字，多望文生义，以为杜诗指的是豪门权贵，酒池肉林多得腐烂发臭。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要明白真正含意，必须先了解“臭”字的本义。“气通于鼻皆曰臭，无香秽之别”，如《蝗经》中一句“其臭如兰”，因为兰花的香气是有鼻共享

的。“臭”字的内涵到何时发生了变化，不得而知。然而，明代诗人叶敬平拜访友人，写过“未进君家门，先闻酒肉臭”，可知所谓“酒肉臭”，实际上是指酒与肉发出的香味飘溢于空气之中。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其意应为：膏富府中飘出的是酒肉的香气，而路途上却是冻饿而死的穷人。鲜明对照，鞭辟入里。

此外，尚有两个简单的事实被误解者忽略。其一，要说肉臭尚可勉强，但酒是愈陈愈香，不会产生臭味的；其二，诗人写的是寒冬季节的事，所以才有“路有冻死骨”之说，在数九严冬，肉是不会发臭的。

与杜诗异曲同工时代更早的，有“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杜诗选定特定的季节，表明了饥与寒两层意思，艺术感染力显得更强。

《长恨歌》因何而作

对白居易名篇《长恨歌》的主题，一直众说纷纭：或认为是赞美爱情的坚贞；或认为是讽刺皇帝的荒淫……有学者将《长恨歌》的创作与白居易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认为《长恨歌》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深情的作品。

据《白居易世系家族考》，白居易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社会门第等级观念和风尚阻碍，没有能正式结婚。分别时白居易曾写下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长恨歌》写在白居易正式结婚前几个月，白居易为失去了与湘灵相会的可能而痛苦。《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白居易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之作。

鲁迅杂文集名诗

鲁迅文笔生涯 30 年，杂文是他最辉煌的成果。他曾把 700 多篇杂文编辑成 16 个集子，即《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在编印新版《鲁迅全集》时，鲁迅研究者又把上述集子之外的佚文编成《集外集拾遗补编》，把分散在鲁迅译作和鲁迅整理编校的古籍上的序、跋、附记等分别编为《译文序跋集》和《古籍序跋集》。有心人从上面 19 种杂文集的书名中，分别摘出一两个字联缀成一首诗，颇有些趣味：

热心华盖坟而已，三闲二心南北集；
自由风月花边文，且介三编集外遗；
译文古籍两序跋，续编补编莫忘记。

诗人转折为何多在三峡

公元 1169—1171 年，爱国大诗人陆游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生了五大转折：

“重商诗歌”、“市民意识”、“公仆行为”、“诗风巨变”、“思想质变”。对古代长期“抑商”政策下人们所鄙视的商人，陆游产生了新的看法：“牛车辘辘载宝货，磊落照市人争传！”明显表现出中古市民对商人、商业的赞赏情绪；与他入峡前简直判若两人：“富商、豪吏多厚积，宜其弃金如瓦砾。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他三年任期将满，政府若不再给他任职，他全家马上就要挨饿。故他不得不上书基本上支持抗战派的左丞相虞允文，请求再任他一个官职以糊口：“……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济，则无策矣。儿年30，女20，婚嫁尚未敢言也。其而不为穷，则天下无穷人！”真是吏者，盖民之役！中央官、地方官他都当过，假如像贪官污吏一样，他何至于穷得连路费都没有，“食粥已逾数月”呢！在古代，30岁的儿子、20岁的女儿没钱结婚！这是何等的清贫与廉洁啊！他原在南宋首都临安时，素有“小李白”诗风。但通过三峡神奇的自然熏陶与人文陶冶，他的诗歌风格迅速转折为“杜甫类诗风”，并且在白帝庙里使他的诗自成一体了：“……邦人祀公孙，力战死社稷……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我欲伐巨石，作碑累千言……下斥乘骡昏！虽渐豪伟辞，尚慰雄杰魂……”陆游赞扬宁死不屈的非正统的公孙述，指斥乘骡向邓艾投降的正统的刘禅，他甚至想当桓温、刘裕式的人物。古代这些人被斥为“乱臣贼子”，而陆游却赞扬他们，由此可见他的爱国思想在三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原为封建愚忠，后变为从国家、民族整个正义立场出发的“大忠”。此正是陆游的“批判现实主义”高于许多古人之处。

杜甫在三峡仅生活两年，却赋出430来首诗，占现存杜诗的1/3。量多而思想内容及形式发生了“转折”，非常重视艺术性与音韵、词语等，不时在雕琢词句、寻求音律上下工夫：“晚节渐于诗律细。”所以，“昔人谓杜子美夔州后诸诗盖最工”。诗的思想内容减弱了一些，如长排律诗“秋日……一百韵”等，比起入峡前吟的“北征”、“奉先咏怀”、“三吏三别”等，其内容的确差多矣。而且他还要儿子宗武熟读《文选》，从中寻摘词句。杜甫第二转折是向三峡民歌学习，他的一些“拗体七绝”便开了“竹枝词”之先河。杜甫的艺术转折到底是想向齐、梁工律方向发展，还是想使近体诗的工律向民歌学习，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后者可能性大些。

白居易过三峡，思想上则由一贯的嫉恶如仇、“兼济天下”转折为“独善其身”。如他在三峡舟中写的五言古风：“……且味随时义，徒输报国诚……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昏昏随世俗……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杜、白、陆、李白……等大诗人的转折为什么都发生在三峡呢？这大概与三峡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有关。三峡百姓的苦难，有时能使诗人（如陆游）更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价值！三峡的幽美，有时能把诗人“幽囚”起来，加速其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退隐山林。三峡的奇特、变幻，有时能加剧诗人的喜怒哀乐，正如洞庭湖上的“春和景明”使范仲淹“喜洋洋者矣”，湖上“浊浪排空”使范“感极而悲者矣”一样。比如杜甫生活的环境——峡中多高山，平地少。平临独东屯，距白帝城一里路，接近稻田。杜甫东屯屋前 flowing 晶莹澄澈的溪水，后枕高冈。周围树林郁郁葱葱，气象深秀。可谓名士、诗人、隐贤的住处！杜甫当年特地择此地而居，反映他已“厌嚣尘而乐

幽胜”，把这儿作为脱俗超尘、专事文学创作之地。因而“一草一木，尽入诗中矣”，一山一水，均或大或小地影响其诗歌创作。

解缙作趣诗

明初才子解缙，从小聪颖过人，能随机应变。相传他 14 岁时，曾写了一幅“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的对联，受到告老还乡一曹姓尚书的青睐。

一天，曹尚书邀解缙过府吟诗，要他当场作鸡冠花诗一首。解缙不假思索随口吟道：“鸡冠本是胭脂染。”首句刚出，曹尚书忽然从衣袖里取出白鸡冠花道：“不是红的，是白的。”解缙不慌不忙接口吟出“今日为何浅淡妆？只因五更贪报晓，至今戴却满头霜。”曹尚书听罢，不禁连连点头道。

永乐年间，解缙科闾成名，明成祖朱棣钦授翰林学士，命解缙主编《永乐大典》，解缙得以侍奉于皇帝左右。朱棣知道解缙学识渊博，吟诗联句对答如流，便经常出一些难题考他。一次，朱棣对解缙道：“爱卿，寡人有位后妃夜里生了个孩子，你替朕做一首诗吧。”解缙立即吟诗恭贺道：“吾皇昨夜降金龙。”朱棣道：“是个公主，不是太子。”解缙马上改吟：“化做嫦娥下九重。”朱棣又道：“可惜已经死了。”解缙接口道：“料是人间留不住。”朱棣道：“已命太监抛入金水河里去了。”解缙续吟道：“翻身跳入水晶宫。”朱棣听了哈哈大笑道：“爱卿真会随机应变啊。”

古代趣诗很多，这里附带举二例。

古代交通不发达，物资交流不易，所以地方出产何物就受用何物，老百姓固然如此，官员一般也不例外。

宋时有个被派在河北三鸦镇做官的，这地方交贫穷，产物主要是莲藕，财政与衣食莫不依此。他在任上觉得清苦难言，便作诗道：“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三餐都是藉，看看口里长莲花。”怨而不怒，颇具妙趣。

苏州地区历来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在宋代，这地带的鱼虾价钱非常便宜，而羊肉却是贵得惊人，当时有一个监征市税的小官员，由于俸禄菲薄，想吃羊肉无此财力，只得常食鱼虾，因而作诗道：“平江（县名，属苏州府）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供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诗意与上一首近似；但作为一个监征市税的官，居然无钱一尝羊肉，看来其人的清廉倒是该称道的。

《毛泽东诗词选》注释若干问题

胡为雄的《〈毛泽东诗词选〉注释中若干问题商榷》一文提出，《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是迄今为止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在选编及注释等方面具有特色的一个选本。但是，这本书的注释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胡文从属于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几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例如：

《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原注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险窄的山路要盘旋六重才能到达峰顶，故名。胡文解释为（下文简称胡释）到六盘山主峰共有 34 个盘旋弯道，主峰高达 2928 米。据当地人说，此山过去有鹿，人们上山顺着鹿的足迹走，故名鹿盘

山，后取鹿之谐音陆改为陆盘山，为书写方便又改成六盘山。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虎踞龙盘）……原注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见《太平御览》引《吴录》）石头即石头城，在今南京市西石头山后。胡释为石头指石头山（又名清凉山）而不指石头城，尽管吴国孙权在公元212年重新依山筑石头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显然是说钟山龙一样蜿蜒南京城东，石头山虎一般踞守南京城西，形容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优越。

《七律·长征》〔三军〕原注称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后泛指整个军队。胡释认为释者似未注意作者曾在批注中作的说明：“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谓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沁园春·雪》〔天骄〕原注称汉时曾称匈奴单于为“天之骄子”，意谓上天所骄纵的人物。胡释为“天之骄子”首先不是汉人对匈奴的称谓（尽管“天骄”后来成为汉人对匈奴族的代称），而是匈奴单于给汉朝的书信听自称。据《汉书·匈奴传（上）》功，单于曾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柳亚子原诗《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说项依刘〕原注为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柳诗作时正值中共中央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在此处表示他虽也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胡释认为说项依刘分明是用杨敬之“到处逢人说项斯”和王粲去荆州投奔刘表这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并用，前人已有先例。国内学界对此诗句亦多作此解释。把说项依刘解作“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一反旧说。但这种解释既不合史实，也不合逻辑。一、历史上楚汉相争时，没有人去劝说项羽依附刘邦，而只有人劝失败后的英雄项羽渡江，以备东山再起。二、柳亚子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他当时避居香港，在中国政坛几乎无足轻重，无力“说项依刘”。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他在诗中说“长江自昔非天堑，道豫何曾庆瓦全”，这显然是赞同共产党打过长江，夺取全国胜利。可见，柳亚子即使有能力，也是不会去“说项依刘”的。三、柳诗是《感事呈毛主席》，柳无车弹铗，通篇牢骚，以致毛泽东在答诗中规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苦把说项依刘解作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与柳诗的整个内容不协调。